

## 儒家關係主義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

李佳澤 劉彥君 夏允中\*

### 摘要

本文首先說明目前研究所定義的婚姻衝突概念、相關研究與限制。其中，目前研究所定義的婚姻衝突概念的限制是，並沒有含攝儒家關係主義的婚姻衝突歷程內涵與說明關係轉化如何產生；因此本文最主要是提出含攝一神文化與儒家關係主義的婚姻衝突歷程內涵，與關係轉化如何產生。本文先說明婚姻衝突的意涵與婚姻衝突的關係轉化、婚姻衝突與關係轉化的相關研究，其中包含說明西方文化下的婚姻衝突理論概述、相關研究與限制，以及儒家關係主義文化下的婚姻衝突內涵與相關研究。本文最後提出含攝儒家關係主義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此模式包含衝突產生的背景因素與個人特質、衝突事件、影響婚姻觀的中西文化背景脈絡、因應衝突的方式、衝突結果，最後朝向關係轉化，並搭配中西文化背景脈絡的智慧以因應婚姻衝突所生之關係困境，藉此回到婚姻關係的平衡，進而減少婚姻衝突與增加關係轉化。本模式也提出，婚姻衝突不僅只有負面的影響，還能帶領婚姻關係中雙方的自我成長及提升關係品質。本文有兩個貢獻，第一就是彌補西方文化為主所定義的婚姻衝突的限制，第二是提出東西文化下的因應衝突方式是如何邁向關係轉化，說明了含攝中西文化背景脈絡下的婚姻衝突歷程內涵與關係轉化是如何產生的。希望透過本文所提出的婚姻衝突的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能協助降低婚姻衝突行為，朝向關係轉化的境界，體會到婚姻衝突不僅只有負面的影響，還能帶領婚姻關係的自我成長及提升關係品質。最後提出本文的限制與未來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文化智慧、婚姻衝突、儒家關係主義、關係轉化、儒釋道、修養

李 佳 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劉 彥 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

夏 允 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國立東華大學洄瀾學院  
(shiah@mail.nknu.edu.tw)

## 壹、前言：當前學者所定義的婚姻衝突概念、相關研究與限制

在研究眾多關於婚姻衝突的文獻時，研究者發現大多的文獻都是採取西方的觀點來建構，鮮少兼具華人本土化的角度來深入探討，以及缺乏全面性地討論，而研究者在研究關於本土化婚姻衝突理論的文獻時，發現其實華人關係主義文化下所特有的衝突因應方式，不僅能夠幫助婚姻中雙方的關係穩定，也讓整個家庭系統及社會環境朝向和諧且安定的方向，進而達到對婚姻衝突者的療效。其中華人關係主義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包含了儒釋道文化(黃光國, 2013a)，其特徵在於華人在人際互動上面會注重家族關係(許詩淇、葉光輝, 2019)，以及儒釋道文化特有的因應方式(利翠珊、蕭英玲, 2016)，因此本文文後都採用儒家關係主義一詞以求統一。例如利翠珊(1995)所探討的夫妻互動歷程，著重於雙方的家族資源差異以及衝突的調適策略，特別的是該研究將上一代的家族角色期待也納進影響夫妻互動的因素，更加指出在傳統文化下，夫妻關係深受夫家家族角色期待的影響，也可從中觀察到雙方在此影響下的互動策略，例如妻子會以反求諸己的方式面對與上一代的關係。關於夫家的家庭影響，劉惠琴(1999)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夫妻衝突時指出，華人的夫妻衝突受到父系結構的影響很深；而除了家族系統會影響夫妻關係外，儒家關係主義文化下的夫妻互動中還包含了緣分、感恩與容忍等因素(利翠珊、蕭英玲, 2016; 利翠珊等, 2018)，這些都是儒家關係主義文化下特有的內隱機制。而在婚姻衝突歷程的研究中，劉惠琴(2003)則以衝突態度、衝突中的回饋歷程以及因應衝突的方式，說明這三者有其相關，並藉此建構了夫妻的衝突歷程；其中回饋歷程包含辯證及調節歷程，此兩種歷程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因素，辯證歷程可以幫助夫妻雙方看見衝突的另一面向，而調節歷程則可以讓夫妻雙方在面對衝突時，使用較合適的方式回應對方，以減少衝突的擴大。

這些研究指出了儒家關係主義文化對於婚姻衝突有其重要影響，然而目前並沒有提出一個完整的模式來說明影響婚姻互動的因素與歷程，以及文化因素如何帶來關係轉化的效果。因此本研究最主要的動機與目的就是要建構「含攝一神文化與儒家關係主義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來系統性地說明西方文化與儒家文化的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本文以下說明婚姻衝突的意涵、婚姻衝突與關係轉化的相關研究，最後提出含攝一神文化與儒家關係主義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這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貢獻。

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影響下，婚姻關係的內涵趨向多元與複雜，但是在西方文化與儒家文化的背後的深層文化影響是一神文化與儒家關係主義文化(Hwang, 2012, 2014)。其中世界三大深層文化與宗教為：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宗教」, 2018)，而明顯的是目前的相關理論都是在一神的文化中所建構，但其他不同文化圈對本體或神的信仰不同，應有所屬發展建構出不同含攝文化的理論(黃光國, 2013a)。因此，本文最主要

的目的為提出含攝儒家關係主義文化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其中要特別指出的部分是，儒家關係主義的文化包含了儒釋道的文化（黃光國，2009），這是因為儒家在宋朝（960-1279 AD）（Wu, 2017）已經融合了儒釋道，學者稱之為儒家關係主義文化（Hwang, 2012）。

## 貳、婚姻衝突的意涵與婚姻衝突的關係轉化

### 一、婚姻衝突的內涵與意義

衝突意指互動歷程中個人或雙方內在知覺感受到對立與不滿，導致對立的想法、態度，進而發生衝突行為，衝突行為則有言語爭執與肢體的摩擦。因此，衝突是一種主觀的內在知覺，也是一種對立的行為，同時更是一種互動的歷程（卓依蓀，2012）。當個體或雙方沒有知覺到因外在環境所造成的不適感時，衝突自然不會發生，然而在衝突發生時，在關係的互動結果下，衝突也有可能造成傷害（Kiecolt-Glaser et al., 2003）。如進一步將衝突的意涵移到婚姻關係裡，婚姻衝突的意涵為婚姻中雙方或其中一人的內在感到不滿，進而在關係裡產生對立的互動行為。婚姻裡的對立行為，除了明顯的衝突行為外，隱微未見的緊張關係也會影響到婚姻品質（Manalel et al., 2019）。也因為婚姻關係的建立來自於雙方的情感結合，因著出生於不同的原生家庭、擁有不一樣的價值觀跟生活習慣，婚姻關係裡的爭執與衝突便時常發生。由此可見，衝突在婚姻關係裡是常見和無法避免的，可能帶來破壞關係的結果，讓彼此的距離變遠，最後導致離婚，但也可能有重建及修復關係的效果（Ridley & Feldman, 2003），而這樣的差別端看婚姻中雙方如何面對衝突。本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探討如何面對這樣的衝突與關係轉化。

婚姻衝突的起因則囊括各式各樣的可能原因，例如在跨文化的研究中發現，金錢問題、性別問題、分工問題、養育子女的意見分歧以及配偶缺乏友善，都與婚姻中的不和諧有關（Dillon et al., 2015）。除此之外，當配偶對對方的個人特質或行為感到不滿意，或是因語言或肢體而導致的傷害，都會造成劇烈衝突（Fincham, 2003），而衝突的最終結果不是繼續維持婚姻關係，就是以離婚結束關係（Goodman et al., 2013）。其中婚姻暴力更是關係的重大創傷，從冷戰、口語到肢體暴力都有可能對婚姻關係造成危害，也因此雙方之間在面對衝突時的行為反應，對於婚姻關係來說十分重要（Birditt et al., 2010）。

而遺憾的是，衝突行為影響的不只是雙方的關係，對於年幼的子女在日後的情緒發展、人際因應方式以及健康上有著巨大的影響，且這三者互相影響又環環相扣。當兒童面對父母之間高張力的衝突時，在情緒發展上容易產生不安全感，而不安全感使得兒童在面對父母以及學校的社交生活時，仰賴自我保護的方式與他人互動，長期下來過度感受到不安全的情緒會嚴重影響健康狀況（Davies & Martin, 2014）。亦有研究進一步說明

夫妻之間的破壞性衝突，除了兒童期外也會影響到青少年的心理及行為問題，例如憂鬱以及攻擊行為的增加（El-Sheikh et al., 2019）。因此婚姻衝突影響的不只限於婚姻關係，對於整個家庭的發展有著直接且重要的影響。且根據家庭系統的觀點，每個次系統皆會互相影響，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的互動不是單向的，親子關係也會影響到婚姻關係的和諧（McCoy et al., 2013），例如在養育子女時的觀念不一致時，雙方如何溝通與調適就是相當重要的事情。

婚姻衝突的內涵不僅僅是行為的對立，其中還包含衝突的原因、衝突的影響、如何面對衝突等等，因此婚姻衝突並非只是一種結果，它包含了靜態及動態性的互動關係。研究者也回顧了文獻中幾個重要的婚姻互動歷程模式，作為本模式發展的依據：有學者將婚姻衝突歷程分成四個要素，分別是利害衝突、衝突導向、衝突回應以及衝突結果（Ridley & Feldman, 2003），這樣的歷程要素強調了衝突的相互關係；有學者則認為互動歷程中重要的因素包含了凝聚力、性關係、共識、角色平等、衝突解決、溝通及情感表達（Rosen-Grandon et al., 2004），這七種要素涵蓋了關係中重要的互動行為；亦有學者提出「要求－退縮」模式在互動歷程中如何影響婚姻衝突（Papp, Kouros, et al., 2009），此模式強調了關係的相互性，當婚姻雙方中有一人以負向行為對待另一方時，關係的互動容易陷入負向循環，例如一方以批評的方式指責另一方時，另一方有極大的可能會用同樣的方式進行互動，這樣的循環互動結果也稱為負向互惠（Salazar, 2015）。由以上的文獻可知過去的相關模式並沒有提出一個完整的歷程模式，因此本文為提出婚姻衝突與關係轉化的歷程，包含了衝突事件、因應衝突的方式、衝突結果及關係轉化，但本研究認為相關的背景變項、人格特質及文化背景脈絡也是需要被納入衝突歷程中，因此這些變項也成為本文所提的婚姻衝突歷程模式的要素，這些變項在後文會有詳細的討論與說明。

綜合上述，衝突其實是一種歷程概念，然而文獻回顧中的歷程因素是單薄的，無法更細緻地顯示衝突歷程的意涵。因此本文進一步將背景因素以及個人特質歸類為衝突起因，接著造成衝突事件時，文化背景脈絡是如何影響婚姻中的雙方因應衝突，而後又會造成什麼樣的衝突結果，最後雙方達到在關係裡的轉化，此論述將會在文後有詳細的說明。

## 二、婚姻衝突的關係轉化

一般而言，婚姻衝突對於改善婚姻關係是可以有幫助的（Goodman et al., 2013），這也是本文最主要探討的主題，即便有學者指出已婚者在平均上比未婚者更加健康，但婚姻衝突更可能導致憂鬱症狀、飲食疾患以及酗酒（Fincham, 2003）等心理疾患。因此婚姻衝突的關係轉化是重要的研究主題（劉惠琴，2003），婚姻衝突未必只是破壞性的影

響，它對於提升關係的品質與滿意度有所幫助（劉惠琴，2003；蕭綱玉等，2018），最重要的是雙方面對衝突的婚姻觀、態度、因應衝突的方式和事後積極的溝通，讓彼此的需求滿足以及使關係更加緊密，這些皆會影響關係的後續發展（Heavey et al., 1993）。

雖然面對衝突時會因為彼此對立而有不適感，但衝突仍具有積極的關係轉化效應，可以幫助婚姻中雙方看見彼此在關係中的問題（McNulty, 2010）。如能在衝突中抱有這樣的信念，對於維持婚姻關係有其助益。也就是說，因雙方源自不同的家庭以及文化背景，所學習到的人際互動方式也有所差異，在婚姻衝突裡帶著自己習慣性的模式與對方互動時，容易因價值觀、習慣不一致而導致衝突的發生，面對衝突時採取的因應方式也會有所不同。而因應方式的分類則可以分成破壞性行為、建設性行為以及退縮性行為三種（Birditt et al., 2010），常見的破壞性行為有吼叫及肢體暴力等等的負面性反應，時常會造成離婚的後果；建設性行為則是溝通及傾聽；而退縮性行為則包括逃離及保持沉默。這三種因應衝突的方式中，建設性行為是最能夠為衝突帶來正向關係轉化、提升婚姻品質的因應方式。也因如此，在關係中抱有衝突能為關係帶來助益的想法，更能為衝突帶來建設性的轉化（蕭綱玉等，2018）。由上述所知，衝突的正面觀點是存在的，婚姻中雙方能透過衝突帶來關係的成長與轉化（Gottman, 1993），並要考量文化背景下的婚姻觀在婚姻衝突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也是本文在後續提出含攝儒家關係主義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會涵蓋的。

## 參、婚姻衝突與關係轉化的相關研究

### 一、西方文化下的婚姻衝突理論概述、相關研究與限制

在西方文化下最主要是受到一神信仰的影響，使西方世界形成了個人主義（Cohen & Hill, 2007），故西方心理學強調自我的心理運作，以及如何滿足及鞏固自我的發展（Burke et al., 2010; Shiah, 2021），在回顧西方心理學的理論時，不難發現有許多的理論都是以自我為重要基礎來發展（Shonin et al., 2014）。而這樣的文化影響也造就了個人主義的世界觀，例如：行為可控制結果的價值觀與公平正義等等（Janoff-Bulman, 1989），這些都與基督信仰中的重要教義有關。由此，西方文化在看待婚姻關係議題時，時常會以自我控制的觀點來面對問題，最著名的即是自我控制理論中的內控信念及外控信念理論（Rotter, 1966）：當個體認為事情的結果可以由自己控制時就稱為內控，反之，當個體認為結果是由外在環境決定時則稱為外控。這樣的二分法理論也不只一個，奠基於Rotter的理論，有學者提出了初級控制及次級控制的二階段理論（Rothbaum et al., 1982），此理論也是常見於自我控制的範疇裡，初級控制指的是個體藉由改變外在環境達到目的，次級控制則是指個體改變自己來配合環境。由此可知，當以這樣的二分法看待婚姻關係互

動時，顯示出西方世界對於關係的互動結果傾向獨斷且不周全，也因此婚姻衝突的文獻中最常被研究的主題即是因應衝突的方式（Fincham et al., 2007）。西方研究以自我控制的觀點發展了許多因應衝突的方式，例如溝通技巧、伴侶諮商等等（徐欣萍，2012），但並未考量到行為的背後有文化因素的影響，以及所帶來的因應衝突方式。

綜合上述，本文不會只限於西方研究所提出的因應衝突方式及技巧，也會提出儒家文化下的因應衝突方式及技巧。例如在儒家文化裡對於事情的發生傾向採用整體的觀點，除了強調佛法的因果論外（Kuo et al., 2022），對於儒家所提出的關係和諧也極其重視（張思嘉、郭士賢，2011；黃光國，2009），以及在看待衝突時如何採用道家辯證的觀點化解關係的僵局，使婚姻衝突帶來的不只是行為的結果，也可以是關係轉化的開始（劉惠琴，2003）。

## 二、儒家關係主義文化下的婚姻衝突內涵與相關研究

當婚姻中雙方經歷婚姻衝突時，除了考量個體本身的原生家庭及價值觀等等個人化的因素外，文化本身是一個重要且影響深遠的因素，這點在西方的近十年研究裡逐漸被重視，因此婚姻衝突中的文化因素也就成為一門研究議題。Hwang（2011）提出「自我曼陀羅模型」的概念，認為以該模型為基礎，可以解釋不同文化底下的人類心智，也進一步說明個人行動與文化傳統的關聯性，認為當個體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問題時，會從社會知識庫裡尋找解決辦法，來進行自我反思與行動（Shiah & Hwang, 2019），而社會知識庫即是文化傳統。儒家關係主義則涵蓋了儒釋道三家的文化內涵（李秉倫等，2015），而儒釋道文化乘載了數千年的智慧與知識，早已成為了華人的集體潛意識（徐欣萍，2012；Shiah, 2021）來影響著我們的心理歷程（Shiah, 2020）。因此，既然儒釋道文化以及西方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文化系統，其對於婚姻衝突的詮釋及見解一定也不相同，基於這樣的概念，本文認為兩個不同文化系統下的婚姻關係，在婚姻衝突歷程的層面也會有所不同。而若是想要幫助在中西文化體系下的婚姻雙方度過衝突歷程，勢必要從補充儒家文化的影響開始。

例如，儒家關係主義中重要的面向，包括面子、緣、忍、中庸，以及在親子間的孝道等等（許詩淇、葉光輝，2019），這些因素時時刻刻都在影響著婚姻關係。舉例來說，婚姻暴力中有時是因為丈夫的愛面子，而形成的失面子，進而導致丟臉及憤怒的情緒（邱獻輝，2018）；華人關係中時常用緣分來解讀婚姻雙方的相遇與相伴，而在衝突時也用相同的概念來化解自己在關係中的不和諧（徐欣萍，2012）；除此之外，華人在溝通上也與西方文化有所不同，忍耐一詞時常出現在華人的婚姻關係裡，這樣內隱的方式雖然可以消弭衝突的發生，卻對長期的婚姻品質有不利的影響（利翠珊、蕭英玲，2008）。從上述文獻可以知道，儒家文化的婚姻關係與西方文化明顯不同，儒家文化重視的是關係中的

修養，以及個人的修養，來達到自我的解構，並回歸到自性的本來面目（夏允中、黃光國，2019）。

從以上的文獻可以發現，一神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婚姻雙方在因應婚姻衝突的過程中，具有各自的文化基礎來達到關係轉化的力量。雖然在儒家社會裡，我們時常聽到婚姻中雙方在面對婚姻時，會以容忍的方式面對衝突，試圖從中找到在關係中得以安身立命的位置，或是以因果業報的方式解讀彼此的不和諧，這樣看似消極的因應行為卻有其深刻的文化內涵，能幫助婚姻中雙方轉化婚姻關係。本研究將嘗試剖析兩種文化內涵的因應方式，探討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經營婚姻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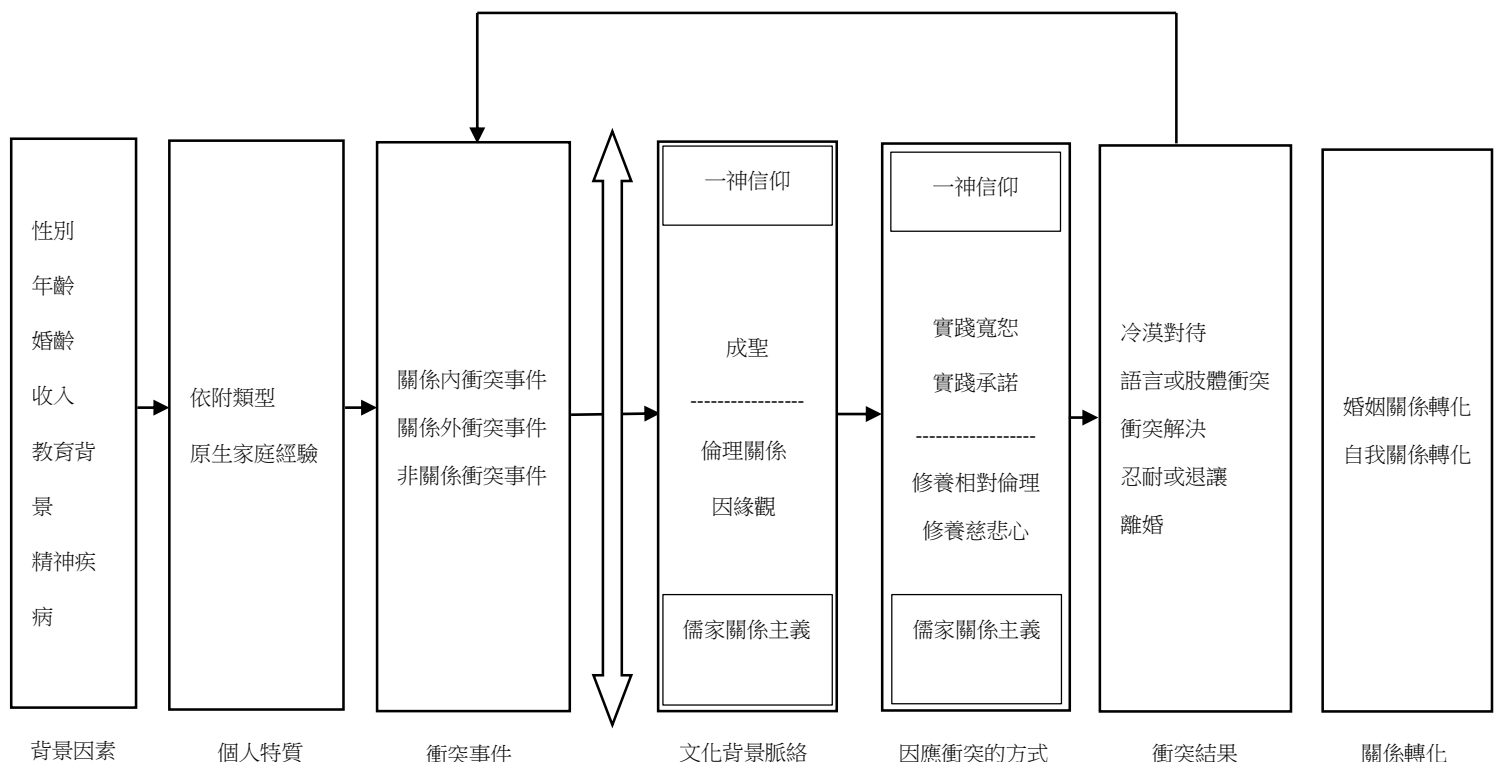
#### 肆、建構含攝含攝一神文化與儒家關係主義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

綜合以上的文獻探討指出，婚姻衝突有助於關係轉化，但目前少有研究詳細說明婚姻衝突的歷程如何幫助婚姻中雙方達到心理層面的有系統轉化。故本文接著提出包含一神文化與儒家文化下的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含攝儒家關係主義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說明婚姻中雙方的衝突歷程，以及東西方文化下不同的因應方式，如何幫助雙方完成關係轉化。

本文所提出之模式依歷程順序包含背景因素、個人特質、衝突事件、文化背景脈絡、因應衝突的方式、衝突結果以及關係轉化。以下，即依此脈絡來詳述（如圖1）。

圖1

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



## 一、背景因素

本文在回顧文獻後發現，有以下六個背景變項較常被研究所提出，以下將一一說明：

### （一）性別

一般而言，婚姻中雙方的性別不同，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就有所不同，尤其在婚姻裡的性別權力更有明顯的差異（巫珍宜，2010），男性傾向擁有較多的支配權，女性傾向用配合及順從的方式維持互動關係。這樣的性別差異主要來自於文化結構的影響，而文化結構會影響社會期待，例如儒家關係主義下的社會期待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方式（利翠珊、陳富美，2004），這讓多數的妻子選擇延續傳統，離開職場以及擔任家庭主婦（胡正文，2011），也認為丈夫是家中的經濟支柱，必須扛起收入的來源（張思嘉等，2018）。因此，如果婚姻裡的性別角色分工有摩擦，就可能會造成婚姻衝突（董秀珠、楊連謙，2004；鄭文烽，2012）。而角色分工會產生摩擦的原因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是其中一方脫離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規範時，彼此會以衝突的牽制方式將對方拉回期待中的性別期待，例如妻子不願意放棄事業而選擇繼續工作，將家庭內的事務交給丈夫時，丈夫可能會對此感到不滿，而產生婚姻衝突；第二種是分工失衡，其中一方對於分工感到不公平時，容易產生怨懟的心情，造成雙方進一步的衝突行為，例如妻子過度承擔家務的分工，或是丈夫過度負擔經濟收入的來源，這都會使雙方的身心壓力升高，而提升婚姻衝突的機率。

性別差異除了影響分工方式外，兩性也在表達方式上展現極大的不同，而表達方式受到了社會文化以及家庭教育的影響（Root & Denham, 2010），而這兩者時常是環環相扣，例如男性被教育要堅強、勇敢、不能哭，導致男性學會壓抑自己的情緒，在表達上容易呈現情緒空洞的現象，或是想表達時卻要考慮能不能表達，進而產生情緒表達衝突的狀況（江文慈，2015）。因此也有研究發現，當丈夫愈深受傳統的性別角色影響時，對於自身的婚姻也愈不滿意（Faulkner et al., 2005），其原因是來自於傳統文化下的男性，在情緒的表達方式較少，容易以壓抑需求的方式與妻子互動。然而，雖然女性被教育要體諒以及溫柔，在情緒的敏銳性及表達上較男性高（陳李綢，2008），但女性如持有傳統信念的程度愈高，在與丈夫的互動中愈容易以服從的方式進行溝通（Pietromonaco et al., 2020）。但不管是男性或女性，只要出現情緒表達的衝突與矛盾，皆會影響到關係的品質，而情緒表達的衝突愈高，在親密關係中感受到親密感的程度愈低（李怡真、林以正，2006），因此更有可能造成婚姻的衝突。

以上的研究指出了在婚姻關係中，雙方會因為性別的差異在各自的性別角色上有不同的社會期待，而這些社會期待會造成個人及關係的束縛，進而在婚姻關係中產生更多的婚姻衝突。



## （二）婚齡

婚姻中雙方進入婚姻後，要面對的不只是生活習慣或是價值觀的磨合，隨著結婚年齡愈久，家庭結構的變動也會直接影響婚姻衝突的產生，因此單就結婚年數來看，婚姻的品質會隨著結婚年數的增加而慢慢遞減（VanLaningham et al., 2001）。即便是新婚，在結婚第一年後的婚姻滿意度也是逐年下降（蕭英玲、黃芳銘，2010），而在結婚的初期，雙方會面臨家庭規則與角色身分上的轉換，無論在金錢、工作、家事安排，以及與其他家庭成員的相處，新婚關係皆需要彼此磨合與調整，並且在這段調適的過程中，形成婚姻長期穩定的互動模式（張思嘉，2001）。

婚姻中的互動模式是否隨著時間的增加具有持續及穩定的性質，在不同的理論及研究中都顯示不一樣的結果，例如社會學習理論及其相關的研究認為互動模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具有穩定性及預測性，相反的，發展及調適性理論則認為婚姻的年數愈長，在因應衝突的方式上愈能夠彈性的調整，並以建設性行為的方式互動（Birditt et al., 2010）。有研究進一步指出，教育程度對於結婚三年內的婚姻關係有其影響力，因教育程度直接反應個人的價值觀及因應衝突的方式，而結婚16年以上的婚姻品質則受到了家庭結構的影響，原因在於結構的變動對於婚姻有長遠的影響，例如子女出生以及與父母同住等等（謝雨生、周玉慧，2012）。因此婚齡對於婚姻關係的影響在於時間的因素，結婚愈久則會產生更多造成衝突的原因，婚姻雙方則必須花費更多時間及智慧來因應衝突，否則衝突會對婚姻關係有嚴重影響。

## （三）年齡

如果更細的以家庭生命週期分成年輕、中年以及老年婚姻來看，年輕的婚姻因子女較小且婚齡較短，因此婚姻滿意度較高，而隨著子女進入青少年或是成年離家時，因婚姻雙方婚齡變長，以及面對子女離家的空巢期，轉而變成雙方不得不面對彼此的關係，容易產生婚姻衝突（沈瓊桃、陳姿勳，2004）。這個現象在華人尤其明顯，夫妻雙方在子女上大學前，會以共同合作的方式面對升學的競爭壓力，此時的婚姻滿意度為最高，但在成功升學後，夫妻的婚姻衝突會劇烈上升（Hsiao, 2017），這也顯示中年婚姻的婚姻衝突中，子女的角色有其影響性。然而當中年夫妻在面對空巢期時，如能增加相處的品質，願意分享及傾聽，對於婚姻的滿意度也能有所提升（Gorchoff et al., 2008）。老年婚姻則因共同經歷許多困境及喜悅的經驗，在同心及共享的程度較高（Seider et al., 2009），也因雙方願意相互依賴以及承擔責任，在婚姻裡有較正向的情緒行為，例如在互動中更加地傾聽及溝通（Birditt et al., 2010）。

話雖如此，老年婚姻仍然與其他年齡的夫妻一樣會有婚姻衝突，但老年夫妻比起年輕夫妻以及中年夫妻有較高的婚姻滿意度（Bookwala & Jacobs, 2004），其原因可能在於

老年夫妻會以忽略的方式面對衝突，因此能經驗到較高的婚姻品質。因此，年齡因素造成的婚姻衝突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不同年齡層的婚姻雙方需要面對的衝突議題不盡相同，然而要度過婚姻衝突就需要雙方耐心的陪伴彼此，以及願意承擔責任。

#### （四）收入

家庭的經濟收入對於婚姻關係有巨大的影響，收入多寡代表著能夠擁有多少資源，也直接反應了社經地位的高低，而低收入往往伴隨著社經地位低下，這造成家庭在資源的取得程度上有困難，且得面對更多的外在威脅，因此收入較低的夫妻會面對更現實的經濟問題以及社會問題（Trail & Karney, 2012）。經濟問題有以下常見的幾種，例如生病時無法看醫生、沒錢享受娛樂、無法購買所需物品等等，可以想像的是低收入家庭在金錢的使用上相當拮据。然而家庭的經濟收入影響的不只是婚姻中雙方的關係，更會影響到孩子的發展，像是增加物質成癮的機率（Dube et al., 2002），以及當子女感受到經濟壓力時，愈容易造成憂鬱情緒的產生（蕭惠瑩、陸偉明，2020），而物質成癮與憂鬱情緒更會在孩子成年期時持續下去（陳杏容、陳易甫，2019）。由上述所知，經濟問題對於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響（陳杏容，2016）。

社會問題則有以下許多種，例如家庭暴力、犯罪、物質成癮以及兒童虐待等等，這些問題的成因來自於家庭的低收入帶來的低教育水準，以及婚姻中雙方可能在幼時受虐或是在貧窮家庭中成長，原生家庭中的不良情緒便持續影響著他們的分化程度，且在成年後繼續尋找與自己在原生家庭中情緒分離程度相似的伴侶，因此兩人容易因分化程度類似而結婚（Van Ecke et al., 2006）。同時，因為低收入帶來的資源短缺，以及無從解決經濟壓力帶來的情緒困擾，更容易以暴力、物質成癮的方式面對壓力（蘇昭月等，2005），例如酗酒及吸毒，並且在互動中較常使用威脅、批評等等的破壞性行為（Birditt et al., 2010），這將進一步造成雙方的衝突增加。總結來說，在面對艱難的收入問題時，低收入家庭比起高收入家庭有了更多婚姻衝突的機會。

除了家庭的經濟收入外，婚姻中雙方的收入差異也會影響到互動關係，當雙方在面對彼此的收入不同時，會因為權力位階的關係產生衝突，甚至是暴力，尤其是當妻子的收入比丈夫高時，更容易引發衝突。此外，丈夫比妻子的收入高雖符合傳統，但卻也顯示妻子的自主權及資源的使用權都較低，也會產生更大的衝突及暴力（楊連謙、董秀珠，2013）。這些衝突原因來自於男性往往被期待成為家庭的支柱，並且成為有擔當、被依賴的一家之主，當收入較低的丈夫面對收入較高的妻子時，仍想繼續維持社會期待的樣貌，而容易使用貶低、遷怒的方式，達到權力的平衡及控制（董秀珠、楊連謙，2004），因此丈夫的自尊心受創和無法接受自己與期待不符，更容易引發婚姻衝突。

從以上文獻可以知道，收入與婚姻衝突有強烈的影響關係，家庭收入的多寡及雙方的收入差異皆會是婚姻衝突的導火線。

## （五）教育背景

教育程度較高者，較有能力打破傳統的家庭分工方式，且高教育者對於婚姻的看法也較平等，能以互相扶持的觀念維繫婚姻（利翠珊，2004），也較容易在遇到婚姻衝突及暴力時，求助社會支持系統（楊連謙等，2005）。有研究則發現，高教育者往往有較高的婚姻品質、較佳的衝突因應能力及溝通方式（蕭英玲、黃芳銘，2010），而低教育水準者則較常使用破壞性行為的因應方式（Birditt et al., 2010）。但教育水準似乎在不同年齡層有不同的影響，有研究發現高教育水準的老年人反而出現更多的婚姻衝突（Guo et al., 2017）。即便如此，還是可以發現教育水準對於婚姻衝突有著積極的影響。

## （六）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除了會造成個人的影響外，進入婚姻時也會對婚姻關係產生巨大的衝擊（Whisman & Baucom, 2012），例如當其中一方是焦慮疾患、物質成癮者或是雙極性疾患等等，容易造成婚姻經營上的困擾（Whisman, 2007）。而精神疾病對於婚姻的衝擊不只是衝突的起因，更可能在衝突時導致暴力及死亡的發生，患有精神疾病者較容易對配偶及其家人施暴，且疾病程度愈高，暴力以及物質濫用的情況也就愈嚴重（楊連謙，2005），也有研究指出邊緣型人格疾患的婚姻暴力加害者，在身體虐待以及精神虐待上更趨嚴重，且有致死的行為發生（林明傑等，2007）。也因為疾病的關係，丈夫容易在家庭中感受到權力低落，因此會以憤怒的方式面對另一半，這樣扭曲的行為模式更容易造成嚴重的婚姻衝突及暴力，且陷落在惡性循環裡無法脫困（楊連謙等，2011）。

從上述的文獻中可以發現，婚姻關係與心理健康互為影響關係，當婚姻中的關係是破裂的，也會大幅增加罹患精神疾病的風險（Bodenmann & Randall, 2013）。雖然關係的不和諧並沒有與特定的精神疾病有所關係，但常見的是當個體愈無法在關係中調適時，憂鬱症狀也就愈嚴重（Whisman & Baucom, 2012）。因此當另一半願意給予適度的婚姻支持以及社會支持時，讓支持成為一種保護性因子，變能夠降低罹患的風險（Feder et al., 2019）。而患有精神疾病者除了容易發生婚姻暴力及衝突外，在進入婚姻前對於配偶的選擇似乎有某種預測性。有大型研究指出，患有精神疾病者的婚姻相似性比起未患有精神疾病者高出許多，意指他們容易在尋找伴侶時選擇與自己某些特質相似的人，例如憂鬱症患者容易與同樣是憂鬱體質或是焦慮體質者結成伴侶關係（Nordsletten et al., 2016），在這樣的配對關係下更容易在婚姻關係裡遇到困難。

## 二、個人特質

### （一）依附類型

依附類型是目前相當常用的關係理論，並影響婚姻關係，依附理論認為個體在小時候與主要照顧者的互動過程會成為一種穩定的依附關係，而常見的依附關係分成安全依附及不安全依附，其中不安全依附又分成焦慮型依附、逃避依附（Bretherton, 1992）。不同依附風格的父母有其不同的教養方式，當父母的教養品質愈高時，子女對於親密關係的期待也愈高，這樣的互動關係形塑了個體的依附類型（Einav, 2014）。當孩子處於青春時期時，父母如能以積極的方式與子女建立關係，例如陪伴、支持等等，子女的安全感有顯著的增加（Ruhl et al., 2015），良好的親子關係也能預測子女在成年期的自尊及親密關係的品質（Johnson & Galambos, 2014）。

人們在原生家庭經驗中所形塑的關係互動，皆會形成自己的依附類型，對於日後的親密關係有著深遠的影響。依附理論的觀點建立在嬰兒與養育者的互動關係，雖大多數的研究著重在母嬰關係，但父親與孩子的依附關係也同等重要（Brown & Cox, 2020），其中父母的敏感性愈高，愈能提升兒童的安全型依附（Bakermans-Kranenburg et al., 2003; McElwain & Booth-LaForce, 2006）。相較於安全型依附，不安全型依附的兒童有著更多的行為問題，例如攻擊他人等等（Fearon et al., 2010）。有研究發現不安全依附會與後來的婚姻衝突有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到婚姻關係滿意度（Besharat, 2003）。焦慮型和逃避型依附的伴侶容易在婚姻關係中發生衝突，而安全型依附的伴侶則傾向於相互依賴，能夠建立安全的關係（Besharat, 2003; Diamond et al., 2018）。由此可見，安全型依附與不安全型依附在互動上有不同的結果，這其中也涵蓋了他們溝通的方式：安全型依附的人傾向用建設性的溝通方式面對婚姻衝突，不安全型依附的人則時常使用需求——退出及逃避的方式面對（Beeney et al., 2019; Domingue & Mollen, 2009），這些不同的因應方式會影響婚姻的互動與關係品質。

### （二）原生家庭經驗

原生家庭經驗意謂著個體從小到大在原生家庭中所經歷的各種事件，這些事件大多數涵蓋了與重要照顧者的關係互動，也由於原生家庭是個體會先經歷情感性、生理性及心理性的地方，因此對於個體的未來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性（張景然、朱玉妮，2001）。不同學者對原生家庭經驗的定義與測量也有不同看法，例如發展原生家庭量表的Hovestadt等（1985）將原生家庭經驗定義為當家庭給予個體自主性及親密感時，就能讓家庭呈現支持性的環境。其中，自主性包含了表達感受及想法、家庭成員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尊重其他家庭成員、對其他家庭成員開放、接受分離及失落；親密感則涵蓋了家庭成員可以表達感受、溫暖及積極的氛圍、衝突解決、對其他成員敏感的同理心以及信任。張景然與朱玉妮（2001）中文化此量表的同時，得出了這些經驗又可以分成親密、和諧、失落接納及信任等四種因素，當得分愈高時，表示個體的原生家庭經驗愈好。另

外，有學者透過蒐集不同向度的原生家庭經驗來測量是否與成年後的負向行為有相關，其中定義原生家庭經驗的向度包含原生家庭中是否有藥物濫用、身體、性和情感虐待以及精神疾病（Banford et al., 2015）。另一項研究則將定義涵蓋了父母是否有離婚、父母的分居史、父母對衝突的知覺以及目睹父母的暴力行為（Langhinrichsen-Rohling & Rohling, 2000）。根據以上的文獻回顧，本文將原生家庭經驗定義為原生家庭經驗品質以及原生家庭經驗影響，原生家庭經驗品質意指個體在原生家庭中所知覺到的正負向事件及感受；原生家庭經驗影響則是指個體成年後受到的原生家庭經驗正向及負向的種種影響。

個人在原生家庭中所經驗的早期經驗以及回憶，對於往後的人格發展及困擾議題有著深遠的影響（Rokita et al., 2018）。個體的早期經驗影響了成年後對事情的看法、知覺，甚至是互動模式，個體會記得類似的相關事件，並在日後不斷被觸發相似的感受與看法，進而塑造出獨特的生命風格（陳偉任等，2019）。因此，我們可以從個體的早期經驗中，探索個體的互動模式起源，以及內在對自己、他人以及世界的看法。

原生家庭經驗也影響著個人的焦慮情緒，例如：父母間經常有衝突、父母的管教規則不一致或打罵式的管教（Park & Walton-Moss, 2012）導致個體在情緒調節上出現困難，並出現情緒失調的症狀（Suveg et al., 2010）。原生家庭裡的經驗也影響著人們日後的人際關係，例如父母之間的劇烈衝突與子女的憂鬱和孤獨感有關係（Kumar & Mattanah, 2018），以及導致青少年對父母的依附關係和人際社交功能下降（Azam & Hanif, 2011），除此之外，也影響著成年後婚姻關係裡的功能與品質（Negy & Snyder, 2006）。夫妻雙方在原生家庭裡皆經歷了良好的互動關係時，便有足夠的能力可以調適自己在婚姻關係裡的衝突（Sabatelli & Bartle-Haring, 2003），新進的研究也證實父母的婚姻衝突與子女的婚姻品質有所關聯（Lim & Lee, 2020）。當個體在原生家庭經驗中曾目睹了父母間的衝突、暴力甚至是離婚收場，都會使日後的婚姻關係產生困難（Dennison et al., 2014），例如婚姻衝突的頻率增加等等。而原生家庭中的氛圍影響了整體家庭及成員的發展，當原生家庭能給予個體愈高的親密感及自主感時，日後所經歷的婚姻衝突程度也就愈低（Farahbakhsh, 2011）。由此可見，個人感知到的原生家庭經驗能否提供健康的功能決定了子女的婚姻關係（Hejrat & Shakerian, 2016）。

綜合上述，原生家庭經驗對於個人有許多面向的影響，不管是人格發展、人際關係或是情緒議題，這些影響皆會在雙方進入婚姻時成為婚姻衝突的起點，使婚姻關係的經營成為具有挑戰性與學習性的重要人生議題。

### 三、衝突事件

婚姻中雙方在日常生活中會面臨許多的衝突，有研究透過日記發現有以下的衝突事

件：生活習慣不同、姻親關係的相處、休閒的安排、金錢的使用、社交活動、工作壓力與收入、家務工作分配、子女教養方式、個性差異、性生活協調、承諾及溝通等等，而衝突頻率最高的是子女教養方式，其次則是家務工作分配、溝通和休閒的安排（Papp, Cummings, et al., 2009）。此研究發現與劉惠琴（2003）在夫妻衝突的議題統計有類似之處，該研究發現最常出現的衝突事件有子女教養方式、溝通、家事分工以及姻親關係的相處，如姻親關係介入婚姻生活。其他的衝突事件還包含財務問題、疾病照顧、物質成癮所造成的經濟問題與家庭經營問題、外遇等等（陳若璋，1992；黃翠紋、林淑君，2014；楊連謙，2013），而外遇是最常見的離婚原因之一（Amato & Previti, 2003）。

有學者認為在婚姻關係中不斷地遇到壓力性事件，則會嚴重地影響婚姻關係品質，進而造成衝突的來源；其中壓力性事件可分成生活危機及生活轉變，生活危機意指個人或家庭必須應對的意外性事件，例如債務、近親離世、被解僱、財產損失、子女離世等等；而生活轉變則為個人或家庭在正常生活階段的轉折點，在這個階段他們必須改變自身的角色，例如兒童的學校轉學、退休、搬家、工作轉移、晉升等等，此外，生活危機比生活轉變更會導致負向的婚姻滿意度（Chi et al., 2011）。

本研究認為基於儒家關係主義下所重視的關係議題，本文將上述衝突事件分類為關係內（包含姻親）衝突事件、關係外衝突事件與非關係衝突事件如下：

#### （一）關係內衝突事件

關係內事件定義為婚姻中雙方的親密議題以及與姻親關係之間的關係議題，例如性生活協調、承諾及溝通、個性差異、姻親關係的相處、近親離世、子女離世、子女教養方式以及外遇等等。

#### （二）關係外衝突事件

關係外事件的定義為婚姻中雙方與其他人的互動議題，例如社交活動等等。

#### （三）非關係衝突事件

非關係事件的定義為婚姻中雙方在日常生活中所要面臨的挑戰，例如金錢的使用、個性不合、生活習慣不同、休閒的安排、工作壓力與收入、家務工作分配、財務問題、疾病照顧、物質成癮所造成的經濟問題與家庭經營問題、債務、被解僱、財產損失、兒童的學校轉學、退休、搬家、工作轉移以及晉升等等。

### 四、影響中西婚姻觀的文化背景脈絡與智慧

早期西方世界在婚姻衝突上的研究少有對於自身文化如何影響婚姻關係的相關發

表，後來有學者指出必須將文化因素納入婚姻關係中的重要議題（Fincham et al., 2007）。宗教不只是文化信仰，還可以在家庭發生紛爭時提供解決策略（Mahoney, 2005），而婚姻中雙方的宗教信仰愈強，參加宗教活動的頻率愈高，他們愈有可能花時間在一起進行有意義的活動，例如幫助子女做家庭作業、花時間一起娛樂、參加習俗活動等等。除此之外，宗教習俗還可以調解宗教信仰對家庭參與的影響（Jorgensen et al., 2016）。因此，婚姻中雙方如在宗教上有高度的信仰時，對於婚姻關係的經營也會跟其他人不同。有研究也認為夫妻在宗教信仰及習俗的靈性信念，與他們的婚姻關係有關連（Rauer & Volling, 2015）。是故，婚姻衝突的歷程要考量到婚姻雙方的宗教信仰在衝突中的影響。有學者試圖了解宗教文化與婚姻品質之間的關係，從一神信仰的角度解釋婚姻衝突的轉化歷程（Goodman et al., 2013），研究發現承諾、宗教信仰與宗教習俗對於婚姻關係的維持有所助益。但是，儒家文化中的信仰，非常重視關係的差序互動觀，透過不同的關係層次對應其不同的相互性的因應方式，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夫婦有別等（黃光國，2001），強調雙方的相對倫理角色，這意指我們並沒有辦法透過單純的努力來改變任何不和諧與衝突的關係，唯有先盡己以及推己及人才能看見關係的不同層次，進而達到關係轉化的效果（黃光國，2013b）。因此，西方文化與儒家文化皆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脈絡，使婚姻關係得以邁向轉化的境界，以下將分述兩種文化下的婚姻觀內涵。

### （一）一神信仰

#### 1. 成聖

基本上，西方人結婚都會在教堂舉行，透由上帝的代言人牧師或神父來祝福婚禮，其中成聖對於西方文化中的婚姻關係有著重要的意涵，而成聖意指讓婚姻關係神聖化，並且可以透過祈禱、敬拜和講道、聚會、儀式等方式來強化神聖性（Mullins, 2016）。因此，西方文化重視婚姻關係中的三角化，也就是上帝與婚姻中雙方之間的關係形成了重要的象徵，使雙方認為婚姻是上帝給予的，意即婚姻是神聖的（Dollahite et al., 2012），也因為上帝是關係中的一部分，對婚姻的承諾也就是對上帝的承諾，這樣的承諾也就需要透過宗教習俗來維持，例如禱告與讀經。婚姻關係則透過宗教習俗的實踐，來強化彼此之間的關係，且藉由這些儀式更靠近上帝。也有研究進一步指出夫妻雙方與上帝的關係會影響到婚姻的品質，因相同的信仰能創造出更頻繁的交流與互動（David & Stafford, 2015）。

Fincham（2007）的研究發現透過婚姻的神聖化過程，婚姻生活的各個方面即具有神聖的特性或意義，也能提升婚姻關係的品質；其原因在於成聖能加強婚姻中的承諾、促進連結、培養積極的情緒並減少消極的情緒，以及面對壓力時具有彈性（Ellison et al., 2011）。進一步來說，人們相信上帝也參與了自己的婚姻，而上帝的同在增加了配偶對婚姻關係的信心，並且婚姻的神聖性提高了他們投入婚姻的時間，以培養和維持婚姻的意

願。

遵循神的旨意下的婚姻關係相處，寬恕與承諾的因應方式可以成功幫助轉化婚姻衝突，承諾與寬恕成為了重要解決婚姻衝突的因應方式（David & Stafford, 2015; Day & Acock, 2013; Fincham & Beach, 2010; Fincham et al., 2007; Novak et al., 2018），承諾能夠幫助彼此在關係中有被愛的感覺（Epstein et al., 2013）。有研究發現，宗教文化對於關係的轉化有極大的幫助，但這樣的轉化是需要時間的（Spencer et al., 2020）。例如西方文化家庭會透過不斷禱告的方式達到關係的轉化，這個歷程主要是向上帝禱告，其內容包含承擔錯誤及責任、寬恕對方與被上帝寬恕，以及解決問題，其中，上帝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使衝突者因感受到上帝的愛及看見背後更大的願景，而願意讓衝突邁向關係和解（Dollahite et al., 2019）。從上述所見，許多研究進一步的探究在婚姻衝突中，寬恕與承諾對於關係品質的影響，以及如何透過「解決問題」達到轉化（Spencer et al., 2020），因此本研究會以這兩點來說明一神信仰下的婚姻衝突因應方式。

## （二）儒家關係主義

### 1. 倫理關係

儒家關係主義文化比起西方文化更重視「倫理關係」，而倫理的實際作用為維持生活的秩序，同時也在關係互動裡具有情感性的特質（余德慧等，2004）。儒家智慧認為實踐倫理關係，就是實踐天道，是個人修養歷程，可以趨向至善（the Good）（Hwang, 2019），達到天人合德（Xu et al., 2022）的最佳心理社會均衡的狀態（Shiah, 2021）。天人合德讓人有與萬物互相感應的感受，並獲得內在的身心安頓（徐進、林俊德、張德聰、夏允中，2019）。倫理關係可以進一步分成五倫的「相對倫理」，以及三綱的「絕對倫理」，其中儒家關係主義下的五倫關係最能代表儒家社會的角色關係（林佳樺、姜定宇，2019；許詩淇、葉光輝，2019；黃光國，2013b）。這五倫分別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中除了朋友外，其他四種關係都蘊含著尊卑與上下的意涵（黃光國，2009）。也就是說，在這些關係互動裡有差序的互動含意，而在這樣的互動裡必須遵循著仁義禮的倫理規範，仁即是親近可以親近的人，義即是尊敬該尊敬的人，禮即是依照親疏和尊卑做出差序性的反應（黃光國，2001）。五倫的相對倫理最重要的概念是「相對性」，意旨個人從內心出發與對方互動，並達到彼此的角色義務，而婚姻關係也是其中的一倫，也須達到夫婦和諧的倫理關係。

華人的婚姻關係除了雙方的關係外，還包含了對父母的關係與對子女的關係，這三種關係構成了儒家關係主義文化下最基本的婚姻觀，且三種倫理關係的權利與義務互相交錯著（陳美華，2003）。也因如此，儒家文化比起西方文化的婚姻關係更顯複雜，婚姻衝突時常不只是婚姻中雙方的問題，甚至還包含了與原生家庭的關係（利翠珊等，2014；陳秉華等，2009；許皓宜、李御儂，2015），而妻子與丈夫原生家庭間的倫理關係也是婚



姻衝突的其中原因，例如婆媳關係。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知道，儒家社會的倫理關係相當複雜，婚姻關係除了有自身的倫理議題外，也要時常面對不同關係帶來的倫理挑戰，因此更有學者認為人的受苦總來自於倫理的受苦（余德慧等，2004），對於儒家文化來說，倫理關係的困境相當常見。

相對倫理以及絕對倫理的倫理規範有其歷史脈絡，儒家社會也相當重視孝道的倫理行為。葉光輝（2009）對華人的孝道行為進行理論建構時發現，孝道對應歷史發展可以分成「相互性孝道」以及「權威性孝道」，「相互性孝道」意指子女感念父母的養育之恩，而發自內心地行使孝道，這是出於關係互動下的親近行為，也是親親法則的運作機制，這也呼應了相對倫理的倫理規範，父母的慈愛與子女的孝順連成一線，奠定了儒家關係主義下的的關係發展；而「權威性孝道」則指基於上下及尊卑的概念，子女以壓抑自身需求的方式對父母行使孝道，這是尊尊法則的運作機制，同時也呼應了絕對倫理的規範，然而當子女以順從的方式與父母互動時，必定產生怨懟及表面的孝順，並不利於關係的和諧發展。

因此相對倫理以及絕對倫理在概念上雖都重視倫理的要求與規範，但在動機上卻有明顯的不同，因此婚姻關係如能在互動上基於相對倫理的概念，以主動性及感恩的態度行使彼此的倫理規範（Leong et al., 2020），以及身為父母、媳婦、女婿等等的角色時，做好本身該盡的義務，對於婚姻關係的經營有其助益（利翠珊、蕭英玲，2016；高旭繁，2013）。

## 2. 因緣觀

在儒家社會中，「緣」的信念扎根於人際互動關係裡，它是一種在儒家文化裡特有的歸因方式（李迪琛、金樹人，2018；徐欣萍，2012），用來解釋各種不同的事物、人際關係等等，並且帶有一種強烈的命定觀及宿命論，因此以緣作為歸因時，時常無法被邏輯解釋，但此概念深植於儒家文化裡，也時常在不同的人際範疇或情境中扮演著積極的影響（Heger, 2015）。

而要探究緣的意涵必須從佛教的十二因緣談起，十二因緣代表的是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以及老死，本源為「本明」，「本明」動念則緣生「無明(煩惱)」，「無明」再緣生「行」，「行」緣生「識」，「識」再緣生「名色」，「名色」緣生「六入」，「六入」緣生「觸」，「觸」緣生「受」，「受」緣生「愛(或惡)」，「愛」緣生「取(或捨)」，「取」緣生「有」，「有」緣生「生」，「生」緣生「老病死」(引自楊中傑，2013)，這十二因緣彼此都是因緣而起，並產生人的輪迴，也可因緣而滅(釋昭慧、釋耀行，2014)。而緣起是佛教的根本法則，緣起性空，所以萬物的組成是依他而有的，無法獨立存在或自己生成的，也就是說必須依靠他者的存在才得以存有(夏允中，2020a)，因此諸法萬象都是互相依存，才有辦法顯現各種人事物的變化，而人的煩惱代表著人會受苦的原因，因此想去除無明回到原來性(本性)空的的境界來脫離輪迴來脫離煩惱是儒

家文化中常見的現象。

因此，因緣觀代表著一個人對於一件事情發生的解讀，小至與陌生人的相遇，大到婚姻關係中的結合，也時常用孽緣、良緣或是無緣等解釋來面對關係中的各種變化。而在婚姻關係中最常使用的說法是「十年修得同渡船，百年修得共枕眠」（許詩淇、葉光輝，2019），這也代表著婚姻中雙方這輩子要相遇，勢必已經在前幾世時結下很深的緣分。然而，因緣觀也是儒家文化中常見的天命觀，徐欣萍（2012）對此發現其四種適應途徑，分別是認命、知命、從認命到知命、從知命到認命，並且根據其不同的途徑有四種調適行為，分別是忍耐、寬恕、努力、感恩，其中最重要的是，個體會依據不同的情境所需，展現出不同的因緣面向，例如：抱持著隨緣態度的人，會透過認命的方式面對新關係的建立，認為不需要強求彼此成為夫妻，而當面對婚姻關係的破裂時便會用無緣的態度來轉化情緒。

## 五、因應衝突的方式

有研究嘗試區辨何種行為將有效的調節婚姻衝突，例如：有研究分類成三種行為技巧，分別是寬恕／犧牲、同情／體諒、撫慰／緩解（Li & Wickrama, 2014）。另外，也有研究對男性的行為進行探討，發現情緒滿足、理解興趣及需求、優先順序、撫慰、精神保證、寬恕、自我批評等行為有助於婚姻品質的維持，其中最重要的是認為妻子在婚姻中有其重要性（KavehFarsani & Mahdie, 2018）。

而本土的研究也試圖將婚姻中雙方的因應衝突行為進行分類，例如利翠珊（1995）在深度訪談華人夫妻後，將因應衝突的策略分成五種，分別是忍耐力克己、大事化小、迂迴繞道、直言不諱以及公平交換，前三種屬於較退讓、逃避的方式，後兩種則是直接溝通及表達的方式。劉惠琴（2003）也根據儒家本土的文化，將夫妻的因應衝突方式分類成順從隔離、宣洩指責、面質挑戰、配合調整以及僵持己見。周玉慧（2009）也從華人的夫妻樣本中發現，因應衝突策略可分為少用策略型、冷戰熱吵型、相敬如賓型及多元應對型，並從中發現夫妻雙方的因應策略具有相互性，其中一方使用何種策略，另一方也會傾向使用該種策略，然而夫妻雙方的衝突策略可能隨著時間或是重大事件而有所變動。因此周玉慧（2011）試圖從縱貫研究中，釐清夫妻雙方長期的衝突因應模式，並歸納出三種策略，分別為「持續少來少往型」、「持續多元反覆型」及「持續相敬如賓型」三大類，也就是說，當夫妻雙方需長期相處時，採取的因應策略會形成一組固定的模式，形成彼此間習慣性的應對方式。類似的發現也出現在利翠珊（1995）的研究中，研究者將夫妻雙方的調適策略進行配對，並將之分類成相敬如賓、歡喜冤家以及貌合神離三種類型，雖該研究並非縱貫研究，但也顯示出夫妻雙方的互動有循環的現象，並漸漸形成穩定的互動模式。

因此，從上述的文獻回顧中可以發現，雖然將因應衝突的行為進行分類有助於實務工作者看待婚姻中雙方的互動，卻也缺乏了從文化脈絡下陳述雙方透過何種的衝突因應方式，來達到關係和諧的效果，例如儒家文化相當重視人際互動，因此便會有其相應的互動模式，以及如果無法達成而產生的心理困擾（許詩淇、葉光輝，2019）。因此研究者認為婚姻中雙方面對衝突的因應方式，都將影響對婚姻關係的主觀感受（Kulik et al., 2016）。接下來將根據兩種不同的文化脈絡，勾勒出其不同的因應衝突方式。

### （一）一神信仰

#### 1. 實踐寬恕

在跨文化研究中發現寬恕的意涵有其文化共通性，包括了認錯及一筆勾銷，且犯錯者會因不當的行為產生內疚及羞愧感的情緒反應（Ho & Worthington, 2018），因此寬恕的內涵似乎包含了情緒及行為的發生。雖然許多研究都指出，寬恕對於婚姻品質的提升有顯著的效果（David & Stafford, 2015; Kermani Mamazandi et al., 2020），但對於寬恕的行為大多都是描述某些行為的增減，例如有學者認為寬恕是指個體在關係中從受傷的狀態逐漸癒合的歷程，且會在行為上展現出漸少的消極行為，以及漸增的同理心（Novak et al., 2018）。而有學者試圖解釋寬恕如何提高關係品質時發現，寬恕內含了積極的行為策略和消極的行為策略，積極的策略意指對關係的努力，消極的策略則是指減少衝突的發生，這兩種不同的行為策略促成了伴侶在寬恕的歷程中原諒犯錯的另一半（Braithwaite et al., 2011）。

因此寬恕似乎是一種動態歷程，它涉及了情感、認知與行動等等階段的決策歷程。其中更細緻的歷程包含了辯證思考、因果歸因、社交參與情緒、社交疏離情緒、趨避動機，以及決定性寬恕和情緒性寬恕，其中決定性寬恕代表著行為的意圖，個體會消除對對方的負向行為，以及增加積極行為，而情緒性寬恕則是指以正向情緒來替代負向情緒，然而個體有可能在寬恕階段時只有決定性寬恕，而尚未有足夠的情緒性寬恕（Ho & Fung, 2011）。從上述可知，寬恕不只是行為的發生，它牽涉了許多複雜的心理歷程，這似乎也代表著寬恕要在婚姻關係中達到轉化的效果需要一定的時間。

然而，多數的研究只看見了寬恕的正向意涵以及對婚姻衝突的作用，卻也忽略了寬恕的行為可能存在著陰影面向，因此有學者指出對於宗教文化的影響應採用二元的概念來看待，意即同時存在著光明面以及黑暗面（Dollahite et al., 2018）。當雙方在婚姻關係中一味地寬恕對方時，不僅無法達到關係的轉化，甚至對於身心方面也有負向的影響，當其中一方的配偶愈傾向表達寬恕時，另一方則會出現愈多的攻擊行為（McNulty, 2011），這代表著雙方處於一個發洩與容忍的互動模式，而這也表示著一個重要的概念，意即婚姻中雙方如何表現出寬恕，以及何時表達是一個關鍵，在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回到個人的內在，辨識自己的在關係中受到的傷害，並願意讓自己從寬恕的歷程中修復創傷。

## 2. 實踐承諾

承諾意指隨著時間的推移個體願意保持關係的意圖 (Novak et al., 2018)，而承諾的涵義包含了公開性質的諾言、愛、信任、安全感及互相支持。其中，信任是承諾的先決條件，破壞信任則被視為對婚姻的最大威脅。此外，婚姻中的情感支持則是讓彼此了解到，當遇到困難時，另一半會在一旁支持，這樣的支持也能產生一定程度的安全感 (Burgoyne et al., 2010)。因此，當婚姻中雙方對彼此有足夠的承諾時，婚姻關係不僅可以繼續維持下去，還能使關係愈來愈鞏固。

由此可見，承諾是一種帶有關係性質的行為 (Day & Acock, 2013)，當婚姻中的雙方對關係的承諾愈高時，所經驗到的婚姻品質也會愈好 (Mitchell et al., 2015)。而有宗教信仰的配偶對於婚姻的承諾愈高時，比起承諾低的配偶，有著更高的婚姻品質 (Mitchell et al., 2015)。因此，承諾不僅可以維繫婚姻關係，也會增強婚姻裡的配偶投入關係的經營。而當婚姻關係出現外遇的衝突事件時，也可以透過承諾重新連結彼此的關係，藉此強調婚姻的忠誠及信任，除了可以幫助降低不安全感外，對於提升婚姻的穩定性也有很大的助益 (曾秀雲、謝文宜，2021)。

不僅如此，當雙方願意在心理上締結承諾時，婚姻關係就會產生高度的流動性，例如雙方的親密感而產生的親密行為，以及以愛的互動而產生的情感交流，這些都讓彼此更能夠積極投入婚姻關係中 (Komiya et al., 2019)。此外，因心理上的承諾並無法客觀的被看見，雙方需要將此份心意化做行動，例如將感激做為體現承諾的方式，或者是送禮、自我犧牲等等，這些發送承諾信號的行為都能夠促進婚姻關係的成長 (Yamaguchi et al., 2015)。

### (二) 儒家關係主義

#### 1. 修養相對倫理

儒家關係主義下的相對倫理，對於華人社會的婚姻關係修養有其助益。而儒家關係主義文化下的婚姻關係不只有單一的雙方關係，因此在看待此文化下的婚姻衝突時，必須要涵蓋周遭不同的關係層次，例如父母、親戚等等，這也是儒家關係主義下要達到倫理療癒的重要關鍵，簡而言之就是要與不同關係的人都達到關係和諧的境界 (黃光國，2013a；鍾文佳等，2019)，我們如何與不同關係的人互動，其實也有一套深層的文化規則。

黃光國 (2001) 以儒家關係主義為基礎，提出了「人情與面子模型」，說明了在儒家文化底下個體如何基於關係判斷，而在不同關係之間採取不同的互動方式，並將關係成份分成了「情感性成份」與「工具性成份」，並依照這兩種成份的比例多寡，將人際關係細分成了情感性關係、混合性關係以及工具性關係，「情感性關係」代表了個體與家人的關係，例如夫妻、兄弟；「混合性關係」代表了個體與親戚、朋友的關係；而「工具性關

係」則代表了與陌生人的關係，此理論模型進一步說明這三種關係以不同的互動法則來達到相對倫理，情感性關係應採取需求法則，以蒐集各種資源來滿足對方的需求，混合性關係則應採取人情法則，而工具性關係則採取公平法則，因此在三種不同的互動法則下所遇到的困境也有所不同，分別是親情衝突、人情困境以及客觀決策。

本文試圖以此模型看待婚姻衝突的因應方式，例如婚姻中雙方就應以需求法則來互相對待，如是冷漠的關係互動則會破壞關係品質，以及婚姻倫理下的互動規範。接著，如是面對伴侶的家人時，例如常見的婆媳關係（許皓宜，2013），對於妻子而言與婆婆並沒有血緣關係，但如果要求妻子以需求法則來互動時，容易造成妻子的心理壓力，接著便會接連的引發婚姻衝突（賈紅鶯等，2013），而婚姻中雙方在面對系統外的人際關係時，例如混合性關係以及工具性關係，如採取不適當的互動法則也會破壞婚姻關係。

從人情與面子模型裡可以發現，儒家文化相當重視不同的關係該如何採取不同的互動方式，而儒家關係文化中最主要的關係是五倫關係（林佳樺、姜定宇，2019；許詩淇、葉光輝，2019；黃光國，2013a，且這五倫在互動關係上也具有其該達到的理念目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然而如果回到個人的層次時，個體在不同的時間、場合、階段時也會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此時所要達到的個人準則就有以下這些：「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義、臣忠」。除了重視個人所需做到的規範外，「相對性」也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握有較大權力的一方，必須先善盡自己的角色義務，這是儒家關係主義下相對倫理的重要精髓。因此在婚姻關係裡，丈夫必須先要求自己善盡義務，如果有一方無法達成便會讓婚姻關係走向不和諧。以上的描述其實都指向了儒家文化中，貫穿個人與關係的互動原則：尊尊法則以及親親法則，在婚姻衝突事件中常見的婆媳衝突（許皓宜，2013），也可以觀察到這兩大法則的運作，雖然婆媳衝突會大幅度降低妻子的婚姻滿意度（Wu et al., 2010），但妻子如能在面對婆媳關係時善用這兩大法則，便能創造出不同的互動關係，例如情同姊妹以及工作夥伴的關係（許詩淇、黃曬莉，2006）。

在婚姻關係中面對任何的關係困境時，相對倫理的修養概念皆可以幫助個人免於過度的付出（黃光國，2013a），因在關係中單方面的付出，沒有接收到相對應的回饋，會造成絕對倫理的悲劇，徒增個人的心理壓力以及委屈。因此相對倫理提供了一種關係界線，讓關係中的任何一方在關係中「盡己」，也視對方的付出程度重新省思自己，在婚姻關係中是否有盡到自己的本分，這也是修養相對倫理中重要的一環。當自己盡了該負的責任，還不能得到想要的結果時，應當不指責他人對自己做了什麼，反而該「反求諸己」，問問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該如何做下一步的行動（黃光國，2013b）。這樣的反思同時也具有倫理療癒的效果。雙方在自己的角色規範上善盡義務，以達到婚姻關係的和諧為目標（Chang et al., 2020），也不逾矩對方該負的責任與義務，並在遇到關係困境時回到自身的領域，重新思考如何進行關係中的下一步，例如溝通、分居或是離婚等等，因此婚

姻中雙方透過相對倫理的實踐，就能在婚姻的經營上不後悔，也能心安理得。

但是相對倫理的實踐常會被當成社會取向的目標或期待社會取向的目標（夏允中，2020b），因而形成了社會的期待與價值判斷。因此，在使用本文所建構的模式時，需要知道我們的行為會被意識或潛意識評價，這些評價有可能會導致情緒困擾。本文對此有兩個建議，第一是只要我們生活在儒家的世界裡，就會受這些評價影響；第二是要說明相對倫理的意涵，而不是單方面被要求這些倫理行為。

## 2. 修養慈悲心

「慈悲心」一詞源於東方心理學，且也是佛教中的核心主題。「慈」是巴利語「metta」，意思是關係親近的人；「悲」是「karunaa」，有悲憫眾生之苦的意涵。由此可知，「慈心」代表希望所有人都擁有幸福的心理狀態；「悲心」則代表衷心希望眾人皆遠離苦痛，這兩個概念緊緊地與佛教環扣在一起（Hofmann et al., 2011）。原始的慈悲心涵義非常複雜，且需要事前準備好修養，例如修養慈悲心之前是需要有修養到有空正見的境界，具備佛法的智慧與沒有煩惱的「定」的境界，（夏允中，2020a）。本文將慈悲心拉到一般人可以使用的定義（黃舒鈴等，2015），在他們的研究中訪談有學佛經驗的一般人，得出慈悲心涵蓋了四大元素，分別是同理心、利他、思擇力及自我覺察與調節。「同理心」涵蓋了覺知、陪伴與傾聽、感同身受和理解他人，這意指當一個人感知到他人的困境時，願意開放自我、傾聽別人的故事，並努力理解他人的想法及情緒；「利他」則包含了不害、關懷與包容、助人行為與無私奉獻，這代表以一種溫暖的態度實踐助人的行為，並在過程中降低需要接受回報的自我；「思擇力」則包含平等心、反思和適切的行動，這意味著一個人了解到自己與他人都是平等的，且有能力對自己的想法進行後設理解，最後帶著覺知做出適合的行動；而「自我覺察與調節」則涵蓋了自我覺察、自我慈悲和自我調節，這代表著個人對自己的情緒與想法保持覺知，並認知到自己的有限性，以慈悲心的態度對待自己，最後有能力調適自己的狀態，保持接納與彈性（黃舒鈴等，2015）。

研究發現慈悲心對於經營婚姻關係也有很大的益處，擁有自我慈悲能力的伴侶，在婚姻品質上有較高的滿意度，自我慈悲是一種自我理解而不是自我批判，當面對自己的缺點時能展現足夠的支持，而自我慈悲所提供的情緒平衡和靈活性，反過來又會讓個體對婚姻衝突採取更具建設性的應對方式（Maleki et al., 2019）。這其中的轉變來自於，當個體對自己慈悲時，內在會感受到幸福與值得，也更能夠以真誠的態度與伴侶相處。此外，具有慈悲心的伴侶在關係衝突時更可以妥協，並同時考慮到自我和他人的需求。相反地，缺乏慈悲心的人在言語上對伴侶的攻擊性明顯提高，因為缺乏慈悲心更容易使他們被負面情緒所吸引，當他們生氣或與伴侶發生衝突時，可能會變得過度反應（Neff & Beretvas, 2013）。

由此可知，修養慈悲心對於婚姻關係的經營有許多的好處，因慈悲心是看見他人的痛苦並希望減輕其程度而產生的，因此慈悲心可以增加婚姻關係的品質（Finzi-Dottan &

Kormosh, 2016)。而慈悲心的修養也可以從冥想開始練習，以慈悲心為基礎的冥想會將注意力放在減輕他人的痛苦上，此種練習不僅可以降低憂鬱及焦慮症狀，對於婚姻衝突也有很大的助益(Hofmann et al., 2011)。其中感恩是修養慈悲心的基礎(夏允中, 2020a)，感恩不僅與個人的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親社會行為有關，也影響著婚姻生活的品質。因感恩是一種個人經驗，當個體的注意力轉移到配偶或關係中的美好事物時就會產生情感流動，而向伴侶表達感激不僅需要積極的態度，還要表達對伴侶的認可和讚賞，這會伴侶感到被理解、被欣賞，因此感恩有助於加強婚姻幸福感、親密感和支持感(Gordon et al., 2011)。

## 六、衝突結果

本文提出以下五個衝突結果都適用於中西文化下的婚姻關係。

### (一) 冷漠對待

冷戰為婚姻關係中常用的其中一種方式(Coyne et al., 2017)，當雙方衝突時選擇以不說話的方式抵抗，並且也放棄訴說自己的需求及心情。然而，在衝突時以不說話的方式緩解升高的情緒或許有其幫助，但更多的是維持冷戰，直到彼此以冷漠的方式互動，慢慢地漸行漸遠，這樣無言的形式替代了雙方交流的機會，更容易影響到婚姻生活的品質，以及醞釀下一次衝突的機會。

### (二) 言語或肢體衝突

婚姻中雙方的激烈衝突可以分成言語及肢體的衝突，其中包括了批評、劇烈爭執、肢體暴力等破壞性行為(Birditt et al., 2010)。當激烈衝突愈大時，婚姻關係的修復也就愈困難。

### (三) 衝突解決

當婚姻中雙方在衝突時使用了合適的因應方式，並且能夠相互支持時，便能使衝突和緩，讓衝突事件得以邁向解決，並提升婚姻品質(Rauer & Volling, 2013)。

### (四) 忍耐或退讓

在婚姻關係中最需要的即是彼此能夠溝通表達，將自己內在的心情與想法與對方分享，如個人時常選擇忍耐並以沉默的方式面對衝突，對於婚姻關係有極大的傷害。而忍耐退讓的行為也類似於犧牲，雖適度的犧牲對婚姻關係有助益，但在沒有另一方的情感支持下，過度犧牲會累積對關係的不滿(Lin et al., 2017)，最後在關係的轉化上也會較

困難。但儒家認為忍讓有其重要性，利用重要關係來修練忍讓與寬容，並要在修養忍讓與寬容的過程中沒有情緒的困擾。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原理是可以縮小與減少自我的執著或慾望（Shiah, 2016），所以可以有效處理人際困擾與衝突的良方，並可以對個人帶來較多快樂與滿足。但是如果只是一味或被要求忍讓，沒有了解背後的智慧，例如不了解相對倫理中反求諸己的先前條件，可能會壓抑情緒造成情緒困擾。另外，本文也認為忍耐與退讓也可以是因應衝突的方式，先避免立即衝突，等雙方的情緒冷靜下來，再來共同處理衝突。

### （五）離婚

如婚姻中雙方時常發生衝突，且未能夠有效地進行溝通時，到最後可能會以離婚收場，當其中一方傾向使用批評、鄙視、防禦與築牆等四種互動方式，將會大幅提升離婚的可能性（Gottman & Levenson, 2000）。然而離婚並不代表失敗，也不代表無法進行任何關係轉化，如個人能夠反思自己在關係中的行為，並願意向內面對自己的傷痛，離婚也能幫助個人活出新的人生。

## 七、關係轉化

關係轉化是指婚姻中雙方能透過衝突帶來關係的成長，讓衝突不僅有負向的影響，還可以帶來正向的轉化功能。因此關係轉化是自我轉化、成長與修養後，導致了婚姻關係的轉化，本文提出兩種關係轉化如下。

### （一）婚姻關係的轉化

劉惠琴（2003）從系統的觀點認為，婚姻中的衝突歷程其實是雙方面對問題時重新調適的過程，更從辯證的角度思考自我與婚姻角色間的衝突，而此辯證歷程就成了婚姻衝突轉化的關鍵，也就是說，衝突或許會帶來破壞，但也帶來雙方成長的機會。例如，不良的互動模式開始轉化成一個能互相信任的互動方式（梁淑娟，2019），然而這樣的轉化是相當不容易的，雙方必須願意開放面對彼此，透過改善原有的溝通方式，以及互相欣賞與感謝，並對衝突事件重新框架並賦予意義，最後彼此選擇寬恕對方，在婚姻關係裡重新承諾（曾秀雲、謝文宜，2021）。

### （二）自我關係的轉化

自我關係的轉化包含了自己的成長與修養，許玉芳（2015）深度訪談受暴婦女的自我關係轉化的歷程，發現了當受暴經驗被重新框架時，可以讓個人重新理解自己與他人的世界，以及找到生活的方向，這過程中個體不斷地長出新力量，得以突破關係困境帶



來的傷害，並重新與個人的內在連結。此外，透過婚姻諮商也能讓婚姻衝突中的個體經歷自我重生的過程，從一個喪失情緒感受與思考能力的人，轉變成一個富有情緒及發展合適人際界線的能力（梁淑娟，2019）。因此，關係的轉化不僅是婚姻關係，也包含了自我關係的轉化。從本文之前的討論也發現，在儒家關係主義中能修養相對倫理也是自我修養的方式之一。

## 伍、結語

本文有兩個重要貢獻，第一是彌補西方文化為主所定義的婚姻衝突的限制，第二是提出東西文化下的因應衝突方式，是如何邁向關係轉化，說明了含攝中西文化背景脈絡下的婚姻衝突歷程內涵與關係轉化是如何產生的。關於關係轉化，主要是以東西方文化作為依據，與當前理論很不一樣的是非常具文化性，必須用智慧及真相與婚姻中的雙方討論，因不同的背景因素及個人特質產生的衝突事件，而這樣的衝突事件是如何產生關係困境，是故要因應這樣的關係困境，必須要借用不同的文化智慧，使用相對應的因應方式來解決。本文希望以婚姻衝突產生的歷程及其關係轉化的模式，系統性、結構性的幫助雙方執行出不同的文化智慧技巧，並教導東西方文化背景脈絡、搭配不同文化的因應衝突方式，以增強關係品質與減少衝突事件，朝向關係轉化的境界，體會到婚姻衝突不僅是衝突的表象，還包含著能帶領婚姻關係下自我成長及提升關係品質。因此，本模式也認為婚姻衝突不僅只有負面的影響，還能帶領婚姻關係的自我成長及提升關係品質。東西方的文化智慧幫助我們能夠在婚姻關係的道路上找到互相扶持及成長的方式，本文所提出的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是根據西方文化（一神文明）與儒家關係主義下的文化意義及內涵。本文所提出的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的限制有三點，第一個限制是無法含攝所有的文化智慧，但此模式最主要含攝兩個文化智慧中重要的元素，應可涵蓋在此兩個文化下的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現象，因此本模式提出發生婚姻衝突時，以文化智慧的角度來詮釋關係轉化的歷程。第二個限制是本文較少提出「一神信仰」與「儒家關係主義」的智慧在婚姻衝突中是如何交相作用，希望後續的研究可以探討這樣的交互作用。第三個限制是本模式目前還缺乏實徵研究支持，雖然此模式可以提供臨床實務者在協助個案面臨婚姻衝突時的解決與關係成長，但未來仍然需要實證研究來支持，或修改本文所提婚姻衝突歷程與關係轉化模式，並提出後續的相關應用。

## 參考文獻

- 利翠珊、張妤玥、鄧皓引（2014）。育兒階段夫妻工作家庭壓力調適：系統界限的定位與轉變。《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7（1），37-72。
- 利翠珊、陳富美（2004）。配偶親職角色的支持與分工對夫妻恩情的影響。《本土心理學研

- 究，**21**，49-83。
- 利翠珊、蕭英玲（2008）。華人婚姻品質的維繫：衝突與忍讓的中介效果。**本土心理學研究**，**29**，77-116。
- 利翠珊、蕭英玲（2016）。夫妻內隱情感經驗：感恩、忍與婚姻滿意度。**本土心理學研究**，**45**，93-128。
- 利翠珊、蕭英玲、陳富美、鄧皓引、丁品瑄（2018）。本土夫妻共識形成與情感增溫：以參與式行動研究深化家庭理論建構與教育實踐。**本土心理學研究**，**49**，207-276。
- 巫珍宜、郭麗安（2010）。憂鬱症患者在婚姻中的性別權力運作過程。**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7**，79-114。
- 李怡真、林以正（2006）。愛情關係中的情緒表達衝突之縱貫研究。**中華心理學刊**，**48**（1），53-67。
- 李秉倫、黃光國、夏允中（2015）。建構本土哀傷療癒理論：儒家關係主義和諧哀傷療癒理論。**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28**，7-33。
- 李迪琛、金樹人（2018）。緣的特性及其對生涯發展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50**（2），341-362。
- 沈瓊桃、陳姿勳（2004）。家庭生命週期與婚姻滿意度關係之探討。**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8**（1），133-170。
- 卓依蓓（2012）。婚姻變奏曲：談婚姻衝突及教育介入策略。**家庭教育雙月刊**，**35**，48-59。
- 周玉慧（2009）。夫妻間衝突因應策略類型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1**（1），81-99。
- 周玉慧（2011）。夫妻間衝突因應策略之類型變遷及其長期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3**（2），229-253。
- 宗教（2018年6月19日）。在**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 林佳樺、姜定宇（2019）。華人角色關係的情緒表達規則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51**，169-228。
- 林明傑、簡蕾如、蔡宗晃、王家駿（2007）。有無邊緣型人格傾向之男性婚姻暴力加害人在暴力行為嚴重性之比較。**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3**（1），27-55。
- 邱獻輝（2018）。從角色默契消失到敵意湧現的惡化歷程：認定伴侶不貞的男性親密殺人心理探究。**教育心理學報**，**49**（3），461-486。
- 胡正文（2011）。性別的社會建構-婚姻的內在與外在。**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4**（1），1-43。
- 夏允中（2020a）。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與心理治療歷程：自我到無我體驗的心理休養療癒取向。**本土諮商心理學學刊**，**11**（1），33-77。

- 夏允中 (2020b 年 12 月 27 日)。當代新儒學的現代性轉化：儒家自性覺醒修養心理治療模式〔論文發表〕。第十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當代新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國際學術會議，桃園市，臺灣。
- 夏允中、黃光國 (2019)。開啟以儒釋道文化的修養諮商心理學理論與實徵研究：邁向自性覺醒的諮商療癒。《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4，1-20。
- 徐欣萍 (2012)。華人關係互動中的緣分運作及其心理適應歷程。《本土心理學研究》，37，57-97。
- 高旭繁 (2013)。通往華人幸福之路：性格特質與文化價值的雙重作用。《本土心理學研究》，39，165-214。
- 張思嘉 (2001)。婚姻早期的適應過程：新婚夫妻之質性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16，91-133。
- 張思嘉、許詩淇、李惟新 (2018)。新好男人，新好女人：當代華人婚姻關係中的角色義務。《本土心理學研究》，50，209-261。
- 張思嘉、郭士賢 (2011)。台灣華人婚姻中的控制觀。《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4 (4)，583-610。
- 張景然、朱玉妮 (2001)。早年家庭經驗的測量：中文版「原生家庭量表」的介紹及信效度考驗。《彰化師大輔導學報》，22，231-258。
- 梁淑娟 (2019)。祖父孫女家內亂倫與婚姻治療經驗之探究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41 (2)，25-56。
- 許玉芳 (2015)。婚姻衝突經驗重新框架：一位受暴婦女的故事初探。《輔導季刊》，51 (2)，21-30。
- 許皓宜 (2013)。從婆媳關係探討代間互動對更年期婦女身心症之影響。《諮商與輔導》，331，30-32。
- 許皓宜、李御儂 (2015)。外遇與分裂：一位男性外遇者的經驗詮釋。《教育心理學報》，46 (3)，449-469。
- 許詩淇、黃曬莉 (2006)。情同母女之外：婆媳關係的多元和諧。《本土心理學研究》，26，35-72。
- 許詩淇、葉光輝 (2019)。華人人際及群際關係主題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52，33-88。
- 陳李綢 (2008)。中學生情緒智慧測量與適應性指標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9，61-81。
- 陳杏容 (2016)。家庭危險因子對少年之學業成就、偏差行為與憂鬱情緒發展的影響：累積危險指數模型探討。《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4，41-83。
- 陳杏容、陳易甫 (2019)。早期家庭經濟劣勢與成年初顯期發展成果之潛在剖析分析與其影響因子。《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2 (1)，89-117。

- 陳秉華、林美珣、李素芬（2009）。人我關係協調之伴侶諮商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0**（3），463-487。
- 陳美華（2003）。佛教的婚姻觀：以《阿含經》為主論。**中華佛學學報**，**16**，24-70。
- 陳若璋（1992）。台灣婚姻暴力之本質，歷程與影響。**婦女與兩性學刊**，**3**，117-147。
- 陳偉任、陳璿丞、徐瑋澤、陳冠旭（2019）。運用早期回憶探討憂鬱症患者之依附風格。**臺灣諮商心理學報**，**7**（1），35-48。
- 曾秀雲、謝文宜（2021）。婚姻關係的信任修復與重建。**教育心理學報**，**52**（3），619-642。
- 黃光國（2001）。儒家關係主義的理論建構及其方法論基礎。**教育與社會研究**，**2**，1-33。
- 黃光國（200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心理。
- 黃光國（2013a）。盡己：儒家倫理療癒的理論。**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26**，7-22。
- 黃光國（2013b）。儒家文化中的倫理療癒。**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7**，1-54。
- 黃舒鈴、胡文郁、溫宗堃、徐鳴謙、釋惠敏、杜正民（2015）。「慈悲」意涵之初探：某佛教學系學生之觀點。**安寧療護雜誌**，**20**（3），231-244。
- 黃翠紋、林淑君（2014）。不同類型家庭暴力事件成因及特性之研究。**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10**（2），91-129。
- 楊中傑（2013）。身心靈和世界之結構及其主宰與生成機制。**佛學與科學**，**14**（1），28-46。
- 楊連謙、葉光輝、董秀珠（2011）。重型精神疾患丈夫為施暴者之婚姻處遇：施暴者之特徵及治療成效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4**（2），311-334。
- 楊連謙、董秀珠（2013）。收入對婚姻權力及婚姻暴力的影響。**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5**，121-146。
- 楊連謙、董秀珠、葉光輝（2005）。精神科專科醫院治療婚姻暴力之經驗。**北市醫學雜誌**，**2**（8），713-721。
- 葉光輝（2009）。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32**，101-148。
- 董秀珠、楊連謙（2004）。丈夫經濟弱勢夫妻權力歷程的性別文化影響。**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1），25-56。
- 賈紅鶯、陳秉華、溫明達（2013）。從系統思維探討基督徒癌婦的家庭關係與靈性經驗。**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7**，243-279。
- 劉惠琴（1999）。女性主義觀點看夫妻衝突與影響歷程。**婦女與兩性學刊**，**10**，41-77。
- 劉惠琴（2003）。夫妻衝突調適歷程的測量。**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6**（1），23-50。
- 鄭文烽（2012）。從家庭生涯觀點初探現代雙薪家庭夫妻的性別分工：以四對雙薪家庭夫妻為例。**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12**，111-144。
- 蕭英玲、黃芳銘（2010）。婚姻滿意度與憂鬱傾向：貫時性對偶分析。**中華心理學刊**，**52**（4），377-396。

- 蕭惠瑩、陸偉明 (2020)。國三生實際家庭結構、經濟壓力對憂鬱情緒之影響：社會支持之調節作用。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34** (1)， 29-52。
- 蕭綱玉、葉光輝、吳志文 (2018)。親密關係衝突中的建設性轉化歷程：行動者與伴侶相依模式之探討。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31** (1)， 29-67。
- 謝雨生、周玉慧 (2012)。下愈況或漸入佳境？：夫妻婚姻品質之變化與相互影響性。 **台灣社會學**， **23**， 101-154。
- 鍾文佳、郭怡芬、夏允中 (2019)。建構儒釋道喪禮儀式的悲傷療癒歷程模式。 **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54**， 59-89。
- 蘇昭月、陳筱萍、周煌智、吳慈恩、黃志中 (2005)。運用敘說探究探索家庭暴力施暴者的成長歷程與婚姻經驗。 **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 **1** (1)， 1-26。
- 釋昭慧、釋耀行 (2014)。「四諦」與「十二因緣」之教。 **弘誓雙月刊**， **131**， 27-30。
- Amato, P. R., & Previti, D. (2003). People's reasons for divorcing: Gender, social class, the life course, and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4(5), 602-626.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03254507>
- Azam, A., & Hanif, R. (2011). Impact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s on parental attachment and social competence of adolesc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8(2), 157-170. <https://doi.org/10.1080/17405620903332039>
-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Van Ijzendoorn, M. H., & Juffer, F. (2003). Less is more: Meta-analyses of sensitivity and attachment interventions in early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2), 195-215.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9.2.195>
- Banford, A. J., Brown, M. D., Ketring, S. A., & Mansfield, T. R. (20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of-origin experience and current family violence: A test of mediation by attachment style and mental health symptom distr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43(1), 84-96. <https://doi.org/10.1080/01926187.2014.954491>
- Beeney, J. E., Stepp, S. D., Hallquist, M. N., Ringwald, W. R., Wright, A. G., Lazarus, S. A., Scott, L. N., Mattia, A. A., Ayars, H. E., & Gebreselassie, S. H. (2019). Attachment styl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functioning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Disorders: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0(3), 275-285. <https://doi.org/10.1037/per0000317>
- Besharat, M. A. (2003). Relation of attachment style with marital conflict. *Psychological Reports*, 92, 1135-1140. <https://doi.org/10.2466/pr0.2003.92.3c.1135>
- Birditt, K. S., Brown, E., Orbuch, T. L., & McIlvane, J. M. (2010). Marital conflict behaviors and implications for divorce over 16 year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5), 1188-1204.

- Bodenmann, G., & Randall, A. K. (2013). Close relationships in psychiatric disorder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26(5), 464-467. <https://doi.org/10.1097/YCO.0b013e3283642de7>
- Bookwala, J., & Jacobs, J. (2004). Age, marital processes, and depressed affect. *Gerontologist*, 44(3), 328-338. <https://doi.org/10.1093/geront/44.3.328>
- Braithwaite, S. R., Selby, E. A., & Fincham, F. D. (2011). Forgiveness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Mediating mechanis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5(4), 551-559. <https://doi.org/10.1037/a0024526>
- Bretherton, I. (1992). The origins of attachment theory: John Bowlby and Mary Ainsworth.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8(5), 759-775.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28.5.759>
- Brown, G. L., & Cox, M. J. (2020). Pleasure in parenting and father-child attachment security.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22(1), 51-65. <https://doi.org/10.1080/14616734.2019.1589061>
- Burgoyne, C. B., Reibstein, J., Edmunds, A. M., & Routh, D. A. (2010). Marital commitment, money and marriage preparation: What changes after the wedding?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5), 390-403. <https://doi.org/10.1002/casp.1045>
- Burke, B. L., Martens, A., & Faucher, E. H. (2010). Two decades of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 meta-analysis of mortality salience researc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4(2), 155-195.
- Chang, S. C., Chang, J. H. Y., Low, M. Y., Chen, T. C., & Kuo, S. H. (2020). Self-regulation of the newlyweds in Taiwan: Goals and strategi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7(8-9), 2674-2690.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20929762>
- Chi, P., Tsang, S. K., Chan, K. S., Xiang, X., Yip, P. S., Cheung, Y. T., & Zhang, X. (2011).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Chinese under stress: Moderating effects of personal control and social suppor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1), 15-25.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9X.2010.01322.x>
- Cohen, A. B., & Hill, P. C. (2007). Religion as culture: Religiou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mong American Catholics, Jews, and Protesta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5(4), 709-742.
- Coyne, S. M., Nelson, D. A., Carroll, J. S., Smith, N. J., Yang, C., Holmgren, H. G., & Johnson, C. (2017). Relational aggression and marital quality: A five-year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1(3), 282-293. <https://doi.org/10.1037/fam0000274>
- David, P., & Stafford, L. (2015). A relational approach to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marriage: The role of couples' religious communication in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6(2), 232-249.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13485922>
- Davies, P., & Martin, M. (2014). Children's coping and adjustment in high-conflict homes: The

- reformulation of 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8(4), 242-249. <https://doi.org/10.1111/cdep.12094>
- Day, R. D., & Acock, A. (2013). Marital well-being and religiousness as mediated by relational virtue and equal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1), 164-177.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2.01033.x>
- Dennison, R. P., Koerner, S. S., & Segrin, C. (2014). A dyadic examination of family-of-origin influence on newlyweds'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8(3), 429-435. <https://doi.org/10.1037/a0036807>
- Diamond, R. M., Brimhall, A. S., & Elliott, M. (2018). Attachment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mong first married, remarried, and post-divorc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40(S1), S111-S127. <https://doi.org/10.1111/1467-6427.12161>
- Dillon, L. M., Nowak, N., Weisfeld, G. E., Weisfeld, C. C., Shattuck, K. S., Imamoğlu, O. E., Butovskaya, M., & Shen, J. (2015). Sources of marital conflict in five culture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13(1), 1-15. <https://doi.org/10.1177/147470491501300101>
- Dollahite, D. C., Hawkins, A. J., & Parr, M. R. (2012). "Something more": The meanings of marriage for religious couples in America.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48(4), 339-362. <https://doi.org/10.1080/01494929.2012.674480>
- Dollahite, D. C., Marks, L. D., & Barrow, B. H. (2019). Exploring relational reconciliation processes in Christian, Jewish, and Muslim families. *Family Relations*, 68(5), 517-533. <https://doi.org/10.1111/fare.12371>
- Dollahite, D. C., Marks, L. D., & Dalton, H. (2018). Why religion helps and harms families: A conceptual model of a system of dualities at the nexus of faith and family life.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0(1), 219-241. <https://doi.org/10.1111/jftr.12242>
- Domingue, R., & Mollen, D. (2009). Attachment and conflict communication in adult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6(5), 678-696.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09347932>
- Dube, S. R., Anda, R. F., Felitti, V. J., Edwards, V. J., & Croft, J. B. (2002).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 alcohol abuse as an adult. *Addictive Behaviors*, 27(5), 713-725. [https://doi.org/10.1016/S0306-4603\(01\)00204](https://doi.org/10.1016/S0306-4603(01)00204)
- Einav, M. (2014). Perceptions about parents' relationship and parenting quality, attachment styles, and young adults' intimate expectations: A cluster analytic approac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48(4), 413-434. <https://doi.org/10.1080/00223980.2013.805116>
- Ellison, C. G., Henderson, A. K., Glenn, N. D., & Harkrider, K. E. (2011). Sanctification, stress, and marital quality. *Family Relations*, 60(4), 404-420. <https://doi.org/10.1111/j.1741->

- El-Sheikh, M., Shimizu, M., Erath, S. A., Philbrook, L. E., & Hinnant, J. B. (2019). Dynamic patterns of marital conflict: Relations to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adjust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5(8), 1720-1732. <https://doi.org/10.1037/dev0000746>
- Epstein, R., Pandit, M., & Thakar, M. (2013). How love emerges in arranged marriages: Two cross-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44(3), 341-360. <https://doi.org/10.3138/jcfs.44.3.341>
- Farahbakhsh, K. (201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of origin and current family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marital conflict. *Counseling Culture and Psychotherapy*, 2(6), 35-60.
- Faulkner, R. A., Davey, M., & Davey, A. (2005). Gender-related predictors of change in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marital conflic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3(1), 61-83. <https://doi.org/10.1080/01926180590889211>
- Fearon, R. P.,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Van IJzendoorn, M. H., Lapsley, A. M., & Roisman, G. I. (2010). The significance of insecure attachment and disorgan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81(2), 435-456.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9.01405.x>
- Feder, K. A., Heatherington, L., Mojtabai, R., & Eaton, W. W. (2019). Perceived marital support and incident mental illness: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45(4), 668-683. <https://doi.org/10.1111/jmft.12343>
- Fincham, F. D. (2003). Marital conflict: Correlates, structure, and contex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1), 23-27. <https://doi.org/10.1111/1467-8721.01215>
- Fincham, F. D., Stanley, S. M., & Beach, S. R. (2007).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in marriage: An analysis of emerging tren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9(2), 275-292.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7.00362.x>
- Finzi-Dottan, R., & Kormosh, M. B. (2016). Social workers in Israel: Compassion, fatigue, and spillover into married life.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42(5), 703-717. <https://doi.org/10.1080/01488376.2016.1147515>
- Goodman, M. A., Dollahite, D. C., Marks, L. D., & Layton, E. (2013). Religious faith and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es in marriage. *Family Relations*, 62(5), 808-823. <https://doi.org/10.1111/fare.12038>
- Gorchoff, S. M., John, O. P., & Helson, R. (2008). Contextualizing change in marital satisfaction during middle age: An 18-year longitudinal study.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1), 1194-1200.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80.2008.02222.x>



- Gordon, C. L., Arnette, R. A., & Smith, R. E. (2011). Have you thanked your spouse today? Felt and expressed gratitude among married coupl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3), 339-343.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0.10.012>
- Gottman, J. M. (1993). The roles of conflict engagement, escalation, and avoidance in marital interaction: A longitudinal view of five types of coupl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1(1), 6-15.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61.1.6>
- Gottman, J. M., & Levenson, R. W. (2000). The timing of divorce: Predicting when a couple will divorce over a 14-year peri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2(3), 737-745.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0.00737.x>
- Guo, M., Dong, X., & Tiwari, A. (2017). Family and marital conflict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coping resource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Biomed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72, S50-S55. <https://doi.org/10.1093/gerona/glw129>
- Heavey, C. L., Layne, C., & Christensen, A. (1993). Gender and conflict structure in marital interaction: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1(1), 16-27.
- Heger, I. (2015).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s of the concept of yuanf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qualitative study with students fro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Vien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7(1), 129-163. <https://doi.org/10.2478/vjeas-2015-0005>
- Hejrat, S., & Shakerian, A. (2016).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marital instability's association with the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the family of origin's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7(1), 1362-1369.
- Ho, M. Y., & Fung, H. H. (2011). A dynamic process model of forgivenes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5(1), 77-84. <https://doi.org/10.1037/a0022605>
- Ho, M. Y., & Worthington, E. L. (2018). Is the concept of forgiveness universal?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omparing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Current Psychology*, 39, 1-8.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8-9875-x>
- Hofmann, S. G., Grossman, P., & Hinton, D. E. (2011).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meditation: Potential fo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1(7), 1126-1132. <https://doi.org/10.1016/j.cpr.2011.07.003>
- Hovestadt, A. J., Anderson, W. T., Piercy, F. P., Cochran, S. W., & Fine, M. (1985). A family-of-Origin Scale.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1(3), 287-297.
- Hsiao, Y. L. (2017).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marital satisfaction during middle age in Taiwan.

-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 22-32. <https://doi.org/10.1111/ajsp.12161>
- Hwang, K. K. (2011). The Mandala Model of Self. *Psychological Studies*, 56(4), 329-334. <https://doi.org/10.1007/s12646-011-0110-1>
- Hwang, K. K. (2012).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 Hwang, K. K. (2014). Dual belief in Heaven and spirits: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morality. In B. S. Turner & O. Salemink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religions in Asia* (pp. 47-62). Routledge.
- Hwang, K. K. (2019). A Psychodynamic Model of Self-Nature.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32(3-4), 285-306. <https://doi.org/10.1080/09515070.2018.1553147>
- Janoff-Bulman, R. (1989). Assumptive worlds and the stress of traumatic events: Applications of the schema construct. *Social cognition*, 7(2), 113-136.
- Johnson, M. D., & Galambos, N. L. (2014). Paths to intimate relationship quality from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 and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1), 145-160. <https://doi.org/10.1111/jomf.12074>
- Jorgensen, B. L., Mancini, J. A., Yorgason, J., & Day, R. (2016). Religious beliefs, practices, and family strengths: A comparison of husbands and wive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8(2), 164-174. <https://doi.org/10.1037/rel0000052>
- KavehFarsani, Z., & Mahdie, A. (2018). Develop a thematic model related to marital quality of the married men's viewpoint: A qualitative research. *Biannual Journal of Applied Counseling*, 8(1), 19-44. <https://doi.org/10.22055/JAC.2018.25017.1571>
- Kermani Mamazandi, Z., Akbari Balutbangan, A., & Mohammadyfar, M. A. (2020). Model test to explain happiness based on marital adjust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forgivenes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6(2), 29-42.
- Kiecolt-Glaser, J. K., Bane, C., Glaser, R., & Malarkey, W. B. (2003). Love, marriage, and divorce: Newlyweds' stress hormones foreshadow relationship chang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1(1), 176-188.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71.1.176>
- Komiya, A., Ohtsubo, Y., Nakanishi, D., & Oishi, S. (2019). Gift-giving in romantic couples serves as a commitment signal: Relational mobility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frequent gift-giving. *Evolution Human Behavior*, 40(2), 160-166. <https://doi.org/10.1016/j.evolhumbehav.2018.10.003>
- Kulik, L., Walfisch, S., & Liberman, G. (2016). Spousal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ies and marital relations in late adulth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3(3), 456-474.

- <https://doi.org/10.1111/pere.12137>
- Kumar, S. A., & Mattanah, J. F. (2018). Interparental conflict, parental intrusiveness, and interpersonal functioning in emerging adulth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5(1), 120-133. <https://doi.org/10.1111/pere.12231>
- Kuo, Y. F., Chang, Y. M., Lin, M. F., Wu, M. L., & Shiah, Y. J. (2022). Death anxiety as mediator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renunciation of desire and mental health as predicted by Nonsent Theory. *Scientific Reports*, 12(10209), 1-10.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2-14527-w>
- Langhinrichsen-Rohling, J., & Rohling, M. (2000). Negative family-of-origin experiences: Are they associated with perpetrating unwanted pursuit behaviors? *Violence and Victims*, 15(4), 459-471.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15.4.459>
- Leong, J. L., Chen, S. X., Fung, H. H., Bond, M. H., Siu, N. Y., & Zhu, J. Y. (2020). Is gratitude always beneficial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interplay of grateful disposition, grateful mood, and grateful expression among married coupl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6(1), 64-7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19842868>
- Li, P. F., & Wickrama, K. (2014). Stressful life events,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marital management skills of taiwanese couples. *Family Relations*, 63(2), 193-205. <https://doi.org/10.1111/fare.12066>
- Lim, S. A., & Lee, J. (2020).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conflict,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family of origin, and children's marital stabil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48(5), 546-561. <https://doi.org/10.1080/01926187.2020.1747370>
- Lin, W. F., Li, T. S., & Chen, L. H. (2017). Sacrifice in a supportive marriage: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buffer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sacrifice in marriag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8(2), 575-589.
- Mahoney, A. (2005). Religion and conflict in marital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1(4), 689-706. <https://doi.org/10.1111/j.1540-4560.2005.00427.x>
- Maleki, A., Veisani, Y., Aibod, S., Azizifar, A., Alirahmi, M., & Mohamadian, F. (2019).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cientiousness and self-compassion with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Iranian married employee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8(76). [https://doi.org/10.4103 / jehp.jehp\\_105\\_18](https://doi.org/10.4103 / jehp.jehp_105_18)
- Manalel, J. A., Birditt, K. S., Orbuch, T. L., & Antonucci, T. C. (2019). Beyond destructive conflict: Implications of marital tension for marital well-being.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3(5), 597-606. <https://doi.org/10.1037>
- McCoy, K. P., George, M. R., Cummings, E. M., & Davies, P. T. (2013). Constructive and

- destructive marital conflict, parenting, and children's school and social adjustment. *Social Development*, 22(4), 641-662. <https://doi.org/10.1111/sode.12015>
- McElwain, N. L., & Booth-LaForce, C. (2006). Maternal sensitivity to infant distress and nondistress as predictors of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securi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2), 247-255.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20.2.247>
- McNulty, J. K. (2010). When positive processes hurt relationship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3), 167-171.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0370298>
- McNulty, J. K. (2011). The dark side of forgiveness: The tendency to forgive predicts continue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in marriag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6), 770-783.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11407077>
- Mitchell, J. C., Edwards, K. J., Hunt, S. B., & Poelstra, P. (2015). Relational commitment as a mediator of religiousness to marital quality.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43(4), 263-270. <https://doi.org/10.1177/009164711504300404>
- Mullins, D. F. (2016). The effects of religion on enduring marriages. *Social Sciences*, 5(2), 1-14. <https://doi.org/10.3390/socsci5020024>
- Neff, K. D., & Beretvas, S. N. (2013). The role of self-compassion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Self and Identity*, 12(1), 78-98. <https://doi.org/10.1080/15298868.2011.639548>
- Negy, C., & Snyder, D. K. (2006). Assessing family-of-origin functioning in Mexican American adults: Retrosp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Assessment*, 13(4), 396-405. <https://doi.org/10.1177/1073191106289809>
- Nordsletten, A. E., Larsson, H., Crowley, J. J., Almqvist, C., Lichtenstein, P., & Mataix-Cols, D. (2016). Patterns of nonrandom mating within and across 11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JAMA Psychiatry*, 73(4), 354-361. <https://doi.org/10.1001/jamapsychiatry.2015.3192>
- Novak, J. R., Smith, H. M., Larson, J. H., & Crane, D. R. (2018). Commitment, forgiveness, and relationship self-regulation: An actor 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of relationship virtues and relationship effort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44(2), 353-365. <https://doi.org/10.1111/jmft.12258>
- Papp, L. M., Cummings, E. M., & Goeke-Morey, M. C. (2009). For richer, for poorer: Money as a topic of marital conflict in the home. *Family Relations*, 58(1), 91-103.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08.00537.x>
- Papp, L. M., Kouros, C. D., & Cummings, E. M. (2009). Demand-withdraw patterns in marital conflict in the hom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6(2), 285-300. <https://doi.org/10.1111/j.1475-6811.2009.01223.x>
- Park, H., & Walton-Moss, B. (2012). Parenting style, parenting stress, and children's health-

- related behaviors.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Behavioral Pediatrics*, 33(6), 495-503.  
<https://doi.org/10.1097/DBP.0b013e318258bdb8>
- Pietromonaco, P. R., Overall, N. C., Beck, L. A., & Powers, S. I. (2020). Is low power associated with submission during marital conflict? moderating roles of gender and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belief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2), 165-175.  
<https://doi.org/10.1177/1948550620904609>
- Rauer, A., & Volling, B. (2013). More than one way to be happy: A typology of marital happiness. *Family Process*, 52(3), 519-534. <https://doi.org/10.1111/famp.12028>
- Rauer, A., & Volling, B. (2015). The role of relational spirituality in happily-married couples' observed problem-solving.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7(3), 239-249.  
<https://doi.org/10.1037/rel0000022>
- Ridley, C. A., & Feldman, C. M. (2003). Female domestic violence toward male partners: Exploring conflict responses and outcome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18(3), 157-170.  
<https://doi.org/10.1023/A:1023516521612>
- Rokita, K. I., Dauvermann, M. R., & Donohoe, G. (2018). Early life experiences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major psychiatric disorders: A systematic review. *European Psychiatry*, 53, 123-133. <https://doi.org/10.1016/j.eurpsy.2018.06.006>
- Root, A. K., & Denham, S. A. (2010). *The role of gender in the socialization of emotion: Key concepts and critical issues* (Vol. 128). <https://doi.org/10.1002/cd.265>
- Rosen-Grandon, J. R., Myers, J. E., & Hattie, J. A. (200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characteristics, marital interaction processe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2(1), 58-68. <https://doi.org/10.1002/j.1556-6678.2004.tb00286.x>
- Rothbaum, F., Weisz, J. R., & Snyder, S. S. J. J. o. p. (1982). Changing the world and changing the self: A two-process model of perceived contro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1), 5-37.
- Rotter, J. B.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80(1), 1-28.
- Ruhl, H., Dolan, E. A., & Buhrmester, D. (2015). Adolescent attachment trajectories with mothers and fathers: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experiences and gender.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5(3), 427-442. <https://doi.org/10.1111/jora.12144>
- Sabatelli, R. M., & Bartle-Haring, S. (2003). Family-of-origin experiences and adjustment in married couples. *Journal of Marriage Family Matters*, 65(1), 159-169.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3.00159.x>

- Salazar, L. R. (2015). The negative reciprocity process in marital relationships: A literature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4, 113-119. <https://doi.org/10.1016/j.avb.2015.05.008>
- Seider, B. H., Hirschberger, G., Nelson, K. L., & Levenson, R. W. (2009). We can work it out: Age differences in relational pronouns, physiology, and behavior in marital conflict. *Psychology and Aging*, 24(3), 604-613. <https://doi.org/10.1037/a0016950>
- Shiah, Y. J. (2016). From self to nonself: The Nonself Theor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124.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6.00124>
- Shiah, Y. J. (2020). Cultural heritages and mental health: Towards the self n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Psychiatry & Mental Disorders*, 5(1), 1-6.
- Shiah, Y. J. (2021).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therapies: Towards self-enlightenment*.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61404-1>
- Shiah, Y. J., & Hwang, K. K. (2019). Socialized reflexivity and self-exertion: Mandala Model of Self and its role in mental health.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2(1), 47-58. <https://doi.org/10.1111/ajsp.12344>
- Shonin, E., Van Gordon, W., & Griffiths, M. D. (2014). The emerging role of Buddhism in clinical psychology: Toward effective integration.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6(2), 123-137.
- Spencer, A. T., Marks, L. D., Dollahite, D. C., & Kelley, H. H. (2020). Positive Rel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Religious Families: Supports and Catalysts for Meaningful Change. *Family Relations*, 70(5), 1514-1528. <https://doi.org/10.1111/fare.12440>
- Suveg, C., Morelen, D., Brewer, G. A., & Thomassin, K. (2010). The emotion dysregulation model of anxiety: A preliminary path analytic examination.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4(8), 924-930. <https://doi.org/10.1016/j.janxdis.2010.06.018>
- Trail, T. E., & Karney, B. R. (2012). What's (not) wrong with low-income marriag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3), 413-427.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12.00977.x>
- Van Ecke, Y., Chope, R. C., & Emmelkamp, P. M. (2006). Bowlby and Bowen: Attachment theory and family therapy. *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Journal*, 3(2), 81-108.
- VanLaningham, J., Johnson, D. R., & Amato, P. (2001). Marital happiness, marital duration, and the u-shaped curve: Evidence from a five-wave panel study. *Social Forces*, 79(4), 1313-1341.
- Whisman, M. A. (2007). Marital distress and DSM-IV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a population-based national survey.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6(3), 638-643.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16.3.638>

- Whisman, M. A., & Baucom, D. H. (2012).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psychopathology.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5(1), 4-13.
- Wu, M. (2017). The process of self-cultivation and the mandala model of the self.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1-11.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0024>
- Wu, T. F., Yeh, K. H., Cross, S. E., Larson, L. M., Wang, Y. C., & Tsai, Y. L. (2010). Conflict with mothers-in-law and Taiwanese women's marital satisfac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usband support.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8(4), 497-522. <https://doi.org/10.1177/0011000009353071>
- Xu, J., Chang, N. S., Hsu, Y. F., & Shiah, Y. J. (2022). Comments on previous psychological Tai-Chi models: Jun-zi self-cultivation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871274>
- Yamaguchi, M., Smith, A., & Ohtsubo, Y. (2015). Commitment signals in friendship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Evolution Human Behavior*, 36(6), 467-474. <https://doi.org/10.1016/j.evolhumbehav.2015.05.002>

## **Confucian Relationalism Inclusive Marital Conflict Process and Relation-transformation Model**

Chia-Tze Li Yen-Chung Liou Yung-Jong Shiah\*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lucidate the current research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marital conflict, related research, and its limitation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marital conflict process has been limited in that it did not consider Chinese relationalism and how relation transformation occur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marital conflict process based on Monotheistic culture and Chinese relationalism and explains how the relation transformation works. The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the Western concept of marital conflict, the Chinese relation-transformation marital conflict, and related research on marital conflict and relation-transformation. I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theories of marital conflict in Western culture, their related research and limitations, and the related studies of marital conflict in Chinese relationalism. The article then offers a Chinese relationalism-inclusive marital conflict process and relation-transformation model. The model includes background factors, personal traits, conflict antecedent event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coping strategies, the outcomes of conflicts, and attaining successful rel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model also considers the wisdom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o cope with the relationship dilemma caused by marital conflict and help people return to the balance of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along with reducing marital conflict and increasing successful rel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marital conflict does not only lead to negative impacts but also enhances self-growth and quality in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This article has two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he first is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marital conflict defined by Western studies. The second is to propose coping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marital conflicts based on Chinese and Western wisdom and how to make successful relationship transformation work. Marital conflict not only brings negative results but also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develop self-growth and improve marital relationship quality. It is hoped that the proposed marital conflict and relation-transformation model could help people reduce marital conflict behaviors



and attain successful relation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present paper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words: Confucian relationalism, monotheism, culture wisdom, marital conflict, relation-transformation, 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self-cultivation*

---

Chia-Tze 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Yen-Chung Liou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Yung-Jong Shiah*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Hui Lan Colleg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iah@mail.nknu.edu.tw)